考古中国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岳南◎著

中国首部考古纪实文学力作

以实物考察历史　以科学发掘真相

追溯文明之源　探寻民族之根



海南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考古中国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岳南 ◎ 著

中国首部考古纪实文学力作

以实物考察历史　以科学发掘真相

追溯文明之源　探寻民族之根



海南出版社

考古中国：“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岳南

简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引爆了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周口店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在美国人转移途中下落不明，由此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大寻找活动。本书主要叙述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发掘、失踪、寻找的全过程。

序 章 历史的记忆

旷野凄凄。朔风凛冽。我以悲剧的心境再次来到人类祖先的故乡——周口店。

这是1991年12月的冬天。

早在70年前，一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的瑞典人就曾来到过这里并大胆预言：“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当时，似乎没有人对这梦呓般的预言感兴趣。6年后，周口店发掘的事实被安特生幸而言中。

1926年10月22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安特生抛出了惊世骇俗的论文——《亚洲的第三记人类——周口店的发现》。文中说道：

“周口店发掘和考察的成果，除了从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哺乳类化石以外，还有鉴定为狒狒和短尾猴的化石以及两件具有特别意义的标本，即一颗前臼齿和一颗臼齿……根据研究，这个遗址的层位可能是早更新世的。不管它属于第三纪晚期还是第四纪早期，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会改变，那就是具有完整而确实的地质资料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已经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以北首次发现。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凭空猜测了。”

惊愕！猜疑！轰动！一切都意料之中。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如同旱天雷轰然炸开，世界人类的目光骤然投向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地。因为在远东以至整个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和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安特生叩开了沉睡50万年的“北京人”的大门。

3年后的1929年12月28日，敏感的中外新闻界又爆出一条新闻：

“主持周口店野外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博士，于12月26日在山顶洞的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的头盖骨。他在现场就把它认出来并亲自细心地挖出……”

仿佛从地震的余波中再度听到海啸的呼叫，“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再度给人类以巨大冲击，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这一发现过去13年后的1942年，同样是冬天，世界各大报刊又纷纷编发了耸人听闻的消息：

“中华社2月21日电，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

灵长类化石神秘失踪……这些化石原于11月初分装在两木箱内，准备运往美国。12月5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京驰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向一艘美国航轮哈立逊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于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立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

“北京人”的失踪同它的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

从1926年到1942年的16年间，如同旋转的万花筒，整个世界几经哗然和骚动之后，人类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不再变更的事实——“北京人”化石的发现，无疑地证明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和此前在英国皮尔唐发现的曙人，德国茅尔厄发现的海德堡人，具有相同的时代性。从而可进一步推断，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并达到他们后来居住的地区。周口店的发现，使有名的《物种起源》作者达尔文创立的人类发祥地在非洲的理论发生了动摇。同时，周口店猿人洞中石器、骨器以及用火证据的发现，又使“北京人”遗址在人类起源科学研究上的地位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这一系列空前并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伟大发现，直接推动了建立人类早期理论的革命。

但是，如此珍贵和巨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岁月的尘烟雾土中匿藏了50万年之久后，仅面世十几个春秋，便神秘地消失了。

“北京人”的失踪，是被盗？还是被毁？是沉入海底，还是早已化作了尘烟？这个谜团久久地在人类心中困扰、翻腾着……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精明狡诈的驻平日军，便开始奉天皇昭令搜寻“北京人”的下落。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部门都开动了迅速旋转的机器，苦心孤诣地全方位探寻“北京人”下落，并由此展开了一场侦察与反侦察，指控与反指控的世界性争夺、争论战。“北京人”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搜寻和论战中，名声大躁，神秘莫测，呈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

1972年8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要位置刊登了芝加哥股票经记人兼商人斯托弗·贾纳斯发布的消息：“悬赏五千美元奖给通风报信因而使我能找到失落的‘北京人’化石的任何人……”

消息传出，贾纳斯立即收到了几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无数个电话。接下来，一场又一场欺骗与反欺骗的闹剧与丑剧在世界范围内上演。

1980年9月，一个被控涉及“北京人”化石事件名叫夏皮罗的美国人，根据探寻的线索来到中国，企图在天津市区一座旧兵营的地下室挖出这一稀世珍宝，遗憾的是一无所获。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原侵华日军著名的731细菌部队一位上尉军医，在气息奄奄，即将撒手归天的弥留之地，向自己的好友吐露了埋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北京人”就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埋藏者就是这位上尉军医本人。为便于日后寻找，他在埋藏地点做了不为外知的暗号。

1998年10月，原日本关东军专门负责搜集情报，名叫中田光男的老特工，向中国政府透露，“北京人”被神秘地埋在了日本某地一个小孩的墓穴内。

中国政府根据两位日本老兵提供的最新线索，分别进行了慎密的分析与搜寻，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眼看20世纪在人类悲喜交织的情愫与泪水飞溅中匆匆掠过。江河东流去，逝者如斯夫。当21世纪的曙光降临大地，光耀环宇之时，“北京人”失踪之谜，仍是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心中之痛，像一部没有结尾的侦探小说令人梦牵魂绕，难以释怀。

然而——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小说永远没有结尾，人类对“北京人”的教仰与热情仍未休止，对它的探寻还在继续。而这种强列表现的人类热情和世界瞩目，决不是一种单纯情绪的流露和好奇的窥探。即使在人类进化到登上月球的今天，远古祖先创世的艰难历程与沉重足迹，依然成为召示后人前行的精神与意志的纪念碑群。

作为“北京人”生栖之地的远东大陆，以及在这块大陆上继续生存并延续祖先血脉的中国人，当然知道“北京人”。但大多数却是从历史课本中知道的，而且仅仅知道它是华夏民族的祖先，50万年左右的祖先。对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知之甚少。“北京人”连着久远的过去，维系着一系列错误复杂的历史事件，要弄清它的全部，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不论这个历史跨度有多么长远，中国人对寻找和研究“北京人”的热情不会衰竭，希望也不会冷却。早在1954年12月27日，于“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就曾代表入会的科学界人士说过：“自从1941年魏敦瑞携走了全套模型去美之后，这些材料全部在美国人掌握和保管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又在美国占领之下，美国一

部分人对这些材料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这些‘北京人’化石材料是中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产，我们绝不能听其丧失。全国人民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宝贵材料的下落。全世界正义的科学工作者也都关心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使之物归原主。”

悠忽50年过去，星转斗移，时空浩渺。历史可以生锈板结，但郁结在人类心中的情感却不会被磨蚀消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呼唤，世界人类在呼唤。

——“北京人”，你在哪里！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

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典人

墨绿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条长龙在干涸的大漠中向远方伸展。一叶木舟飘然而下。

安特生独坐船头，打开随身携带的考古专用牛皮包，轻轻取出一卷散发着墨香的书藉翻动起来。——这是刚刚轰动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书的作者是名噪一时的瑞典地质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

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同行，他对斯文·赫定并不陌生。只是几年不见，想不到这位普通的地质学家，由于在中国西域一连串考古探险和重大发现而轰动欧洲，成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大字号巨星。

安特生颇不服气，但又无力更改这眼前的事实。

小船在当地渔夫的熟练操纵中疾速而下。安特生无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线描图示，一双复杂中透着些许得意的目光，再度转向脚下的河流和远方那坦荡无垠的神奇大漠，思索着过往岁月中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神奇得如同神话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v Richthofen,1833～1905)的事业来到远东大陆，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按照试着的准备和策划，这位极具探险精神和科学头脑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担任翻译、文书和脚夫等职。接着又购买了十五峰骆驼和十匹马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探险队，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发。

斯文·赫定一行几人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很快进入塔里木河，这时已是九月下旬。由于航道难测，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个多月才到库尔勒新湖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斯文·赫定开始组织人员围新湖测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直赴罗布泊地区。在这里，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来这一带有十几个湖泊，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罗布淖尔，是一个咸水湖。经过仔细勘察鉴定，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28年之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

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经过发掘，很快找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的汉文文书。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楼兰”字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文书中，纸页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左右。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汉代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想不到在造纸术发明不久，汉朝就把用纸张写就的文书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边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座边远的城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斯文·赫定在发掘楼兰之后，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更为久远的米兰古城，并通过发掘，揭开了楼兰由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秘密。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携走了大量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书的名字就用他的导师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对这条古代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命名——《丝绸之路》(Silk Road)。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他本人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领发的维多利亚奖章。

就在斯文·赫定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失踪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学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这支考察队于1901年春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安特生后悔自己选错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他坚信也一定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声名。在一番捶胸顿足的悔恨之余，他暗暗地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的联系。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

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面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

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途程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大洋（这一时期或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大洋，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8个大洋）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对此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氏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

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者面对科学而做出了新的抉择。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田野考察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同时代的矿物化石源源而来。一批批化石标本由北京迅速运往瑞典乌普萨拉(Upsala)大学，供维曼(Carl Wiman)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幸运的时机与独特的环境，令安特生很快成为野外地矿考察领域的开拓者。1914年秋，他成为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田野遗址。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开始受到同行的敬慕并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可喜的成果使他在经费上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须适应历史，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声名并把他的事业推上辉煌顶峰的契机，真正而富有戏剧性地降临了。

北平街头的奇遇

1918年2月某日，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麦格雷戈·吉布（J.MeGregor Gibb）教授，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对化石特有的兴趣，当即出示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详细地点是叫一个鸡骨山的山崖左侧，这个鸡骨山是由于红土中随处可见到鸟类骨头而得名。前几天我到那里考察后亲自采到了这些粘有骨头碎片的泥块。”吉布教授得意地说着，将碎骨从泥块中剥下递给安特生。

“这些泥块是充满特色的红土构成的，我发现这种土在周口店地区许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见到。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小碎骨，大部分骨头是空腔的，显然属于鸟类骨头……”吉布教授的叙述对安特生来说极有诱惑力，这不仅仅是由于安特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激起他最大兴趣的则是因为在这之前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案例。

20年前，一位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里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专家，但极具科学头脑的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当他在1903年离开中国之时，便把买到的“龙骨”经过认真挑选，装在木箱内带回了他的国家。此后不久，哈贝尔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当时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Max Schlosser)教授研究。

施洛塞尔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后，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龙齿”化石中，有两颗是人的牙齿，且有一颗属人的上第三臼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首次破天荒的发现。

如果那时的施洛塞尔敢于公布他研究鉴定的真实成果，那么亚洲具有远古人类生息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23年公布于世，安特生的声名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相反的是哈贝尔这位普通的医生将会占据报纸头条，成为传奇性人物并载入科学史册。但是，令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二人遗憾终生的是，他们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只把两颗人类牙齿当作类人猿的而匆匆公布于世了。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与伟大的发现荣光失之交臂。但是，这两颗牙齿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为早在1856年，就有德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Java Man)，而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这一发现，不能不引起繁感的学术界重视。

安特生来华后，始终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的研究成果，并隐约感到在远东大陆特别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未泄其秘。他在广泛向中国科学界外籍朋友写信的同时，总要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

一念至诚，感动上天，安特生的好运正式来临。

二十年前哈贝尔在北京中药店买到的“龙骨”，当然不会确知它的详细产地，但来自华北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华北地区是主要的“龙骨”产地，北京药店不会舍近求远从南方购买。也许，施洛塞尔发现的牙齿就来自周口店……想到这里，安特生的身心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偶然的巧合，但又不情愿否定这个念头。他安捺住心中急如潮涌的波澜，匆匆谢过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室静静地默想起来。

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途程。此时，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迈出的这一步，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这个地点之所以被科学界发现并引起兴趣，在于附近的燕山山脉因造山运动而沉积了距今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与寒武纪石灰岩，除外还有侏罗纪的砂岩，因地壳变更而形成的大理石和花岗岩石等等。在奥陶纪与侏罗纪的地层中，夹有较厚的煤层，可供开采。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

堆积物更是随处可见而保存齐全。

安特生根据麦格雷戈·吉布教授预先指明的路线，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约两公里处的鸡骨山。这里最初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奥陶纪的石灰岩中有明显而较多的石灰石矿。吉布教授正是在这里一种深红色砂质粘土里发现了要找的化石。

安特生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

他发现，眼前的深红色砂质粘土，是地壳变更之时，由于石灰岩断裂，粘土才得以充填进来。很明显，土层充满石灰岩洞，石炭岩炉膛将泥土中的物质小心地保存下来，并逐渐从填洞的土层转变成可分离的石柱特色，无数碎骨化石就粘贴在这独立高耸的石柱上。这宛如古塔似的石柱，离地座约5.5米，直径1米左右。上面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差不多都被捷足先登的科学家剥光，不能轻易地摘取了。

安特生挥动考古控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

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两个背包，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去向同行显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一切。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4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这样安排，安特生放弃了周口店的进一步考察，率领助手转入河南，一头钻进了三趾马化石的田野调查发掘之中。

3年后的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荐举，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可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

京后，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格(Walter Granger)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格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重要的是让葛兰格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的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师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葛兰格在寺庙稍作休息后，随师丹斯基一道向鸡骨山走去。在发掘现场，葛兰格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

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当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现场休息时，从山下走来一位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的几位长鼻子洋人，又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突然转身说：“你们是要挖龙骨吧？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龙骨，没有必要在这里傻费劲了……”

安特生坐着的身子猛地站了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对“龙骨”的开采和收集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周口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和开采“龙骨”他不知道，但据他1918年的那次访问调查，此处几乎每家都有“龙骨”收藏，有的卖给药店，有的则当作一种外伤药以备自用，因为用“龙骨”制成的药物可以止血愈伤，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情睐。而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埋入地下的古人类与古动物骨骼，有的因年代久远成为化石，此种骨骼被研成粉沫后，撒到刀割或创伤的裂口上，确有止血愈伤的作用。从1918年安特生来周口店那时起，他在心中就作着这样的结论：也许当年哈贝尔收购的“龙骨”就来自这个荒野山坡之中。

安特生不能错过这个线索，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中年汉子后，便整理

好工具包，同师丹斯基、葛兰格一起跟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

新地点很快到达。这里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约150米左右，是一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10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状陡立着，极其危险，用不了几场风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着一条填满堆积物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大的收获。"

安特生等人小心地来到裂隙前，只见堆积物由石灰岩碎片、砂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并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沾在一起。几个人搜索了很短时间，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

猪骨化石的发现，说明了这是一处比鸡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几个人在堆积层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怀揣具有伟大发现的玫瑰梦返回寺庙。

当天晚上，几个人坐下来仔细鉴别采到的各种骨化石。葛兰格将一件奇异的下颌骨反复琢磨后，举棋不定地递给安特生鉴别。尽管这件下颌骨的牙齿已经缺失，但安特生还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及独到慧眼，大胆推测出是一种鹿骨化石。这一论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阳的光照中沿一条直路，从居住的寺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走去。

新的调查收获出乎意料，采到的化石不仅有同先前相同的看似奇异的下颌骨，而且牙齿保存完好，葛兰格赞同了安特生先前的论断，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正式确定名为"肿骨鹿"动物化石。而和"肿骨鹿"动物化石同时采到的还有犀牛牙齿、鬣狗的下颌骨、熊类的颌骨碎片……这一切的发现将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呼唤已经开始了。

晚上，几个人在破旧的寺庙里喝着掺水的烈酒，庆贺这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现。安特生决定让师丹斯基在老牛沟继续发掘，他和葛兰格返回北京。许多年后，安特生在他的回忆中说道，这一夜，他们激动得几乎没有闭眼。当翌日清晨准备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时，山下坝儿河的洪水猛涨，暴雨狂卷着水流从山谷奔腾而下，切断了去路，只好望洋兴叹。直到第四天清晨雨过天晴之后，二人赤裸着身子，淌过齐胸深的水向车站走去。

安特生在回忆录中特地提到，在和师丹斯基于山下握手作别时，他面对朝霞映照下的周口店和鸡骨山，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

之一。”

回到北京，安特生对师丹斯基的发掘工作仍不放心。几天后，他又来到周口店。

这次，他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并观察到岩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条狭窄的石英脉矿，这条脉矿从山顶一直伸到发掘地。

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起源时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中拣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尽管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还是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当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我始终充满存在人类遗骸的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师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领会而已。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当时的师丹斯基却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第二章 惊梦

走进仰韶村

我之所以在此前和之后的一章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安特生，不只缘于他最早叩开了沉睡5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的大门和他日后的声名，更在于这位瑞典人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考古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所言：由于安特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亲自示范的“田野方法”和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现与论证，对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进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

因而，要提到“北京人”的发现，不能不提到安特生；要提到安特生，就不应忽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关于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因为这是他生命和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如此，才能看到一个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学术准备。同时，也从另一个测面提醒读者，“北京人”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到不如说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科学家长期探索和进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思想与学术准备，要发现闻名于世的“北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根据助手刘长山发现的线索，来到河南渑池县作田野考察，并在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外一条峡谷的北面，发现了石器时代的堆积。几分钟后，在堆积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美丽磨光的表面上清晰地绘有黑色的花纹图案。稍后，又连续发现了精美的彩绘罐状物。

面对这异乎寻常的重要堆积和丰富遗物，特别是容器片和磨光彩陶，安特生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是后来他回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偶然翻阅了三本由庞帕莱撰写的1903年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考察的论文后，才幡然醒悟，并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土耳其斯坦安诺所发现的陶器绘画碎片，庞帕莱认为应归于金属时代的早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仰韶发现的陶片就与尼安德特晚期的文化有一定联系。由此可以推断仰韶的彩陶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问题一旦明了，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同年秋天，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

的发掘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M·de摩尔冈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却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文化特别是彩陶的发现很快闻名于世，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安特生也由此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非凡的声誉。

继仰韶遗址发掘之后，名声大噪的安特生又于1924年跑遍大半个甘肃，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村落、基地遗址。1925年夏天，他开始筹备一项以新疆为地点的中亚考察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在这个地区开展内容包括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三个方面的考察研究工作。这个考察计划于1926年初获得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的支持。正当安特生准备在20年前斯文·赫定一举成名的大漠深处大显身手，弥补当年的遗恨之时，却意外地传来了周口店发现远古人类的消息。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作环球旅行，现已抵达美国并很快转往日本

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于皇太子抵达日本东京前，作好在科学界方面的安排，然后共同前往中国。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King Gustavus Vl Adolphus)，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中国在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作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安排包括其它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一件一箭多雕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北京人”横空出世

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当然，让安特生几乎目瞪口呆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

——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准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学者和

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的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辞，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辞。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作了题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会议上演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继梁启超之后，在华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报告他和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Father Emile Licent)在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的收获。德日进是应天津北疆博物馆（现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父的邀请来到远东进行工作的。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家对人类远古的研究和探索极具前瞻性，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界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中国的考察成就早被世界所熟知。欢迎皇太子盛会当然应该有法国人参加并演讲。

由安特生作报告的时候到来了，他是作为压台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

安特生先是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作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

“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很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周口店出土的臼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这件标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尔描述过。它是一颗左上第三臼齿。它的牙根合并，但齿冠磨蚀得很厉害。根据石化程度，施洛塞尔认为它可能属于第三纪的，分类上暂时放在‘真人？’或‘类人猿？’，施洛塞尔在描述这个牙齿时所作的推论很值得回味。他当时指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发现对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入会者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顶点关于人类

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

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使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的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尖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经入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物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利普（A.william Grabau）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的权威报纸《晨报》以显著位置作了这样的报道：

周口店发现之最古人类牙齿

安特生前晚在瑞典皇储宴会席上发表演说。

安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地点，位于北京二十五英里地内，曾在这里掘得人类牙齿一枚，现已变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证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

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植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发现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初，不过后来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类人散布于爪哇等地。近几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山加丁氏及李中特氏发现原人石器，证明亚洲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后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现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广为分布。而此时之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有采寻。惟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骸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获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处可寻。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发现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义而语。安氏因如此之发现，而开科

学之新纪元……此种发现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今番之估计，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一百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又该科学家等已正式公布此种古人迹之发现，将定名为“北京人”，并称此种极珍贵之“北京人”，已与世界最古之其它二原人遗迹，即“皮尔唐人”与“海德堡人”将并陈列于欧洲博物馆内，以供世界考古家之研究。又谓此种发现公布后，举世人类将对北京及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发生新的兴趣云云。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它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蓦然回首，以无尚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那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

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发掘计划。周口店的发掘开创了一个国际真诚合作先例的同时，取得更加伟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加拿大人的发掘计划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首当其冲的是步达生（Davison Black）教授。这位来自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学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应聘来华并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研究。他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当安氏在进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时，就积极邀请其参与工作。而步达生不负厚望，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后来安特生请他准备一个关于研究仰韶村出土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步达生热情合作，很快写出了颇受科学界重视的论文《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为安特生的成名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步达生关于中国华北人遗骸特征的研究，其论证之慎密，质量之高，一直作为常被引用的关于中国人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论文之一，并成为后来的人类学家很难逾越的高峰，。

尽管步达生和安特生于1926年初筹备的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项目，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但由于周口店的意外发现与强烈的震撼力，使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把目光盯上了“北京人”并由此为进一步发掘事宜热切地奔波起来。他迅速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南按：当时尚称学校）院长胡顿(A.B.D.Fortuyn)，要求更改先前的中亚考察计划，把资助经费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同后来的燕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外各门各派的教会纷纷向中国渗透，如著名的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等。“协和”、“燕京”都是公理会创办。其庞大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教会本身和美国各大财团，如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这些财团对“协和”和“燕京”都有大量捐款。协和医学院尽管坐落于中国北京，却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其毕业生受领的是纽约州州长签字的羊皮文凭。入校学生要取得一纸羊皮文凭，一般需在燕大和协和两个学校努力八年方可得到（一般先在燕大学习三年语言方面的知识，然后转协和学医学），后来在中国医学界颇为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艰苦地完成了八年学业，又毕生从事于医疗事业的一个典范。

北京协和大楼是由十几座五层、四层、三层连在一起的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巍峨、雄伟的古典建筑群，协和礼堂与附属医院皆与大楼连在一起，全部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建成筑。内部装修全为当时最考究、先进的西式设备，包括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等等，全是一色从美国用轮船输送而来。楼群的四周是一条用磨砖构筑的高大围墙，围墙除东南角毗邻其他建筑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其建造工艺之精湛，内部构造装修之严谨，外观之华美，号称整个远东无有匹敌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的实际地位胜过故宫，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它则比法国的卢浮宫更为珍贵和重要。

有史可考的是，协和大楼的主体建筑群是在满清豫亲王府折除后，在原地兴建而成。第一代豫亲王多铎，是皇太极第十五子，与多尔衮同时入关。其人战功赫赫，权倾朝野，满清定鼎中原后被封为亲王世袭罔替，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最后一代豫亲王名懋林，受封于光绪二十四年，其时大清帝国已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刻。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民国建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名事件，那些攀附在枯树上的众位亲王们，树倒猢狲散，各自谋划出路，京城内的王府纷纷出卖。就在这个时候，早已散了架的豫王府卖给了由美国人主持的财大气粗的协和。其价格为十万两银元，约合三万美金，不足两千两黄金。

据说，协和在王府盖新楼挖地基时，无意中掘出了大量窖藏，内含整缸的银元宝、金元宝，以及名目繁多的金银财宝。数额之巨，价值之大，不但超过了购买整座王府的地价与房价，而且抵得上协和大楼的造价。有知情者认为，像这样的王府深宅，窖藏上二三十万两银子，万把两黄金，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回忆一下当年老豫亲王多铎在朝野内外的声势，即可想见府邸窖藏之富。而随着老豫亲王的去世，藏宝的秘密

慢慢在家族中式微，最后竟不为后世子孙所知，想不到乱世之中竟落入了美国人的腰包。想想当年一座王府仅卖得三万美金的价钱，只要拆几根金丝楠木房柁就抵消不少，何况如此庞大的窖藏财宝。如此奇闻轶事，一直令后人为之唏嘘慨叹。

无论如何，气度非凡，美伦美奂的协和大楼，是在北京最显赫昂贵的地段拔地而起了。整个建筑群分东西南北四门，南面正门在东单三条，是医学院的大门。其附属医院之门，正对帅府园。东面的后门，供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出入。连通的东单北大街，有护士楼、教授宿舍。北面为边门，是通机器房、厨房，进煤出灰的出入口。整个建筑群显得大而不乱，秩序井然，充分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层面上的审美追求。

鼎盛时期的协和号称世界一流的医学家与附属医院，以及医护人员与设备，当时远东唯一的一台“铁肺”就在协和。1937年春，美国煤油大王的儿子到北平游览，突然发病倒地不起，幸亏进住协和靠这台“铁肺”的效力保住了一条小命。当这位康复的儿子在协和医院两名高级美女护士的陪同下，乘专列赴天津塘沽，再转乘煤油大王专程派来的豪华邮轮打道回府时，中外媒体纷纷报道，协和的名声再度响遍世界。——当然，这对周口店的发掘与协和的合作关系而言，则属于后话了。

早在1925年夏天，步达生在筹备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计划时，就曾有了设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想。为这个设想的实现，他不止一次地找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埃德温·恩布里(Edwin R.Embree)，请求给予资金上的帮助，而恩布里的答复是：在提出任何计划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必须得到一个保证，即了解所提出的建议将是中国科学界认为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机构需要中国方面的参入与合作。而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一个最理想的合作单位，因为这个研究机构将能够直接促进地质调查所自己的发展计划。如果这项合作能够成功，那么，可在北京建立一个古代人类遗骸博物馆，用以收藏和陈列所发掘的材料，基金会所付出的用于田野考察和研究方面的资金，可从博物馆的门票等方面逐渐收回。

步达生在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初步支持后，很快写信给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商量。未久，步达生得到了丁文江下述的保证和答复：“您不必怀疑中国科学家们对建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态度。虽然我不能代表别人讲话，不过我确信您将会得到我们全体关心科学研究的同胞的衷心支持。”

步达生的热情奔波，获得了初步成功。

第三章 云集周口店

中美合作的先声

周口店远古人类遗骸的适时发现，使极度兴奋中的步达生立即决定将这项发

掘和研究事宜，纳于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之中。在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一番措商后，步达生又来到中国地质调查所，同继丁文江之后新上任的所长翁文灏会谈。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步达生陈述了自己的计划和见地："依我看来，在周口店发现上新世晚期或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或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类人猿化石，是史前人类学领域中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重要发现。现在很清楚，在第三纪后期或第四纪早期，东亚确实存在过人或者同人十分密切的类型。在这个时间的前后，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Eoanthropus)生活在皮尔唐(Pildown)、海德堡人(Heidelberg man)生活在茅厄尔(Mauer)。实际上所有这些类型都是同时的。它们由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西南和向西移动了一样远。这足以表明，中亚高原最可能是它们的共同分化中心。因此，周口店的发现，立刻给我们计划的中亚考察团以一个补充的推动力，它敦促考察团在出发前先着手一个最重要的有联系的追加项目，即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

步达生的计划，得到了翁文灏的同意和赞许。谈话结束时，翁文灏提议最好以信件的形式交换两人的谈话内容，以作为中外官方正式签署的合同。

一个星期后，步达生将信件寄于翁文灏。信中说道：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周口店研究计划和成立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报告给胡顿博士，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起草的计划纯属提案性质的，如果要全部兑现，首先必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两方面的赞助和支持。"又说："在希望得到这样的人的问题上，我和胡顿博士充分摆出理由，请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申请每年拨给一万二千元的为期两年的经费。这笔经费归我们处理，以支付一位专门研究周口店的古脊椎动物学家的薪水和野外工作费用。提出这个申请时，下述各点首先得到强调：（1）本研究项目采取同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2）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研究，1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它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其次，在作出这个申请时明确：虽然在上面提到

的两年的预算以外，没有请求另外的款项，但是周口店研究应该有一个附加的目的，那就是使这项研究成为一个核心，围绕它将来会组织其它合作项目，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下面起草的那样的一个研究机构。”

翁文灏接到来信的两天之后，即给步达生写了一封既维护国家权益，又尊重外国专家意见的复信。这封信及后来打成的周口店发掘的协议书，均被曾主持过周口店山顶洞人发掘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收藏。信的原文如下：

尊敬的步达生博士：

“我已收到您十六日寄来的关于我们那次谈话的来信。您在信里，对所谈合作项目提出了一个一般轮廓的提案。对于这个有着高度科学意味的提案，我甚感满意。我认为，对于地质调查所来说，能有您的合作是莫大的荣幸。总的说来，我同意您在信中所起草的建议。有几点在这里再略加说明，这样做也许比上次谈话时我所说的要更加清楚一些。”

“关于周口店研究：我完全赞同您对周口店研究所提出的建议。为此，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这样做，可以使他将来能够和您提出参加此项工作的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合作得更好。在需要的时候，调查所还可以提供一位或两位地质学家担负地形学和地质学的调查。调查所可以资助一小部分工作经费。不过，我们认为经费最好全部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提供。”

“我对于提出的有关材料分配和人类及其它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建议深感满意。勿须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

“我们调查的最近期目标是周口店。但研究工作最终可以扩展到今后我们可能同意的其它有希望的目标上去。”

“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确切的立场讲清楚了，尽管调查所的任何承诺须得到部长的特别授权才可做出，然而我想，在这样的科学事务上，我可以用调查所的名义讲话，并且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合作计划将会很快变成现实。”

作为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后，即以理学博士的身份走进丁文江筹办的地质调查所，开始野外考察研究工作。根据考察成果，提出了著名的“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的理论。后来，翁文灏接替丁文江成为地

质调查所所长。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和成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是翁文灏上任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多少年后，科学界还一致公认翁文灏不但具有杰出的科学才能，而且更具有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界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清醒的头脑和出色的领导组织艺术，在他和步达生的通信中可以见到。

步达生在他所写信的第（2）项条款中提到，“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它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

不知道是由于步达生的疏忽还是处于其它目的，他对“人类及类人猿化石”最后的权属问题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又恰是整个协议中最为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翁文灏的复信中，他将材料的使用权和归属权加以区别，并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勿须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

作为中方代表的翁文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保持的明确立场和在整个大局上的合作态度，不能不令人表示敬佩。而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美国方面的代表，步达生也具有充分的协商和谅解精神，深暗中国哲学中“舍得”的道理，无所“舍”便无所“得”。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学识、头脑和心胸，要促成这项世界考古史上伟大的发掘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

步达生在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立即复信表示：“我和胡顿博士都完全同意您来信所补充的各点意见……”

1927年1月3日，北京协和医学院胡顿接到美国纽约发来的电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为周口店发掘项目拨款二万四千元。

同年2月14日，中外双方经过一番严肃认真地协商和斟酌，终于达成协议。周口店的系统发掘计划，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共同参与支持下，于这年的春天正式付诸实施。

一颗漂亮的人牙

第一批派往周口店发掘的主要指导和实施者为：

李捷，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主要担负地质、地貌学的调查，负责与地方当局、土地所有者的交涉及管理从事发掘的招聘工人等行政事务。

步林，由维曼教授推荐的瑞典古生物学家。1927年3月16日来华，

担任古生物研究专员和周口店发掘顾问。

刘德霖，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格的技工，曾跟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考察团进行为期两年的野外考古发掘。主要担任周口店发掘技术助理兼室内修补化石专员。

谢仁甫，原为步达生的办事员，担任刘德霖的助手。

周口店合作项目名誉主持人为丁文江。具体事务负责人为步达生、翁文灏。

至此，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的周口店发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1927年4月16日正式拉开了帷幕。

根据步达生的最初估计，整个周口店的发掘，在两个月甚至六个星期就可结束。但实际上整个遗址含化石堆积之大、内容之丰富、问题之复杂以及工作之困难，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正如后来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所说："其实，经过半个多世纪时断时续的发掘，周口店含化石的堆积至少还有一半保留在那里，未弄清楚的问题和新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成堆地摆在我们面前。"对此，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不得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持续下去。

1927年10月16日，维曼的学生步林在当年师丹斯荣发现第一颗人类牙齿的旁侧，从发掘的化石堆积中找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这个发现令步达生喜出望外，经过一番仔细鉴别并认为确实无误之后，步氏于10月29日写信向早已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报告了这一喜讯：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步达生说："10月19日晚，当我于6点30分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步林在那里。他身穿野外服装，风尘仆仆，但脸上却挂着高兴的笑容。他不顾战乱而完成了这个年度的野外发掘工作，在10月16日发现了那颗牙齿。真是交了好运，终于从堆积物里挖到了这颗人牙。我太兴奋、太惬意了！步林向这儿来的时候，甚至没让他一道来华的妻子知道他已回到了北京。他真是一位我志同道合的人。我希望您转告维曼博士，我多么感激他派步林到中国来工作。"又说："我现在已有50箱左右的材料运到北京。它们是上次战乱期间于7月下旬运回来的。（南按：战乱指张作霖与阎锡山之间的战争，据说常有士兵晃着手榴弹钻进周口店步林工作的山洞躲避）还有300多箱尚未从周口店启运。地质调查所的李捷先生正忙于设法弄到车皮将这些材料运回来。今天，我已经在娄公楼

地下室安排好地方存放这批材料。这个地方，对于在楼上新生代研究室上班的步林来说，是很方便的。”

步达生认为步林发现的这颗人类牙齿，是一颗成年人的左下第一臼齿，性质与师丹斯基发现的那颗臼齿一致，在其发表的《周口店堆积中一个人科下臼齿》论文中，步达生提议为周口店的发现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遗憾的是，这个学名没有兴盛起来，倒是当年葛利普提议的俗名“北京人”，却被科学界和大众所广泛接受并延续下来。

这年的周口店发掘于步林发现人牙的第三天，圆满地划了句号。

1928年4月，举世瞩目的周口店发掘再度开始。

由于李捷和刘德霖调往其它考察团参加发掘，经中外双方协商，决定派杨钟键和裴文中两人加盟，并由杨取代李捷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

1926年，翁文灏在给步达生的信中，曾提到“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翁文灏所说之人就是杨钟键。自此，北京大学地质系出身，后留洋深造的杨钟健，于1928年春归国未久，即加入到周口店发掘队伍的行列这中。而后来发掘的事实充分证明，翁文灏看重和栽培的这位一流的科学家，对中国古人类学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杰出贡献。

而这个时候的裴文中，只是作为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一名学生，来周口店负责管理工人账目和携助步林与杨钟健工作的低级职员。这一年，裴文中刚满24岁，那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的重大发现，还要等到一年之后。

尽管由于军阀混战而使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度停止，但这一年的成果却比梦想的要大得多。在1927年步林发现过牙齿的东北角堆积层之上10米处，发现了“北京人”住居的洞穴。另外，还在堆积层中发现了20多块人类牙齿和两块下颌骨碎片。步达生在认真研究之后，发现这两块下颌骨碎片，一块属少年，一块属成年。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使步达生更加确信他在去年仅凭一个牙齿就建立起来的“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个新属新种理论的正确性。

正如安特生所说：“资金、耐力和出色的签别力是发现新财富的基础。”周口店的发掘，正是具备了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爆响了一年之后那誉满全球的伟大发现。

大山深处的裴文中

1928年周口店的发掘，尽管以可喜的成果作了注释，但它存在的危机也日渐明显。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专款即将用完。同时，两年的发掘和研究使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周口店遗址绝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丰富的化石内容，复杂的地层堆积，无不证明它和周围更广大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想彻底弄清楚周口店遗迹所表现出来的地质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貌学和考古学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和它有关联的一切地域。

正是鉴于这诸多原因，极富远见的步达生于1927年底离开北京，到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汇报详细情况，并提出由该会继续为周口店发掘增款的希望。在步达生的热心周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了他的全部请求。除为周口店发掘继续增款外，再调拨4000美元作为1928年发掘的追加经费。

步达生以兴奋和满足的心情于1928年秋返回北京，当他和前来迎接的丁文江握手时，满怀激情地说道："丁博士，我非常高兴地对你说，他们似乎同意了我提出的全部请求。一项更加伟大辉煌的事业将从这里再度开始。" 1928年冬，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又制定出一个为期3年的发掘计划。这个计划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同合作，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11万美元的庞大发掘研究经费。为避免在日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麻烦，需正式建立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是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一切发掘研究计划将由这个组织机构掌管。

1929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共同拟定的章程上签字画押。

协议规定：丁文江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标本将暂时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便于研究。当标本保存在地质调查所时，亦应随时为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中国政府农矿部很快批准了这具有非凡科学意义的章程及一切附加协议。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已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拨给新生代研究室。至此，周口店的发掘研究计划，已彻底将几年前步达生和安特生发起的那个中亚考察计划所取代。不同的是，这个计划的中心点是人类祖先的圣地——周口店。

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它的直接收获是导致了1929年底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造成了“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由于扩大了的考察、发掘、研究计划，当1929年春天来临时，新生代研究室做出决定，调步林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工作。调杨钟健同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起去山西和陕西各地调查新生代地质情况。如此一来，周口店发掘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25岁的裴文中一人身上。

对于周口店发掘的人事安排，新生代研究室在此之前就已作过反复考虑，由裴文中主持发掘，则主要来自丁文江、翁文灏两人的建议。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所言：作为地质调查所创始人的丁文江，不仅是一个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赋有卓越智慧的著名地质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先进的西方科学方法和技术。地质调查所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行政成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田野考察人员，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按当时的规定，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路程都要步行的体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将这些人分派到各地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察工作。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调查中，这些受过训练的大部分成员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裴文中，正是在接受了这样严格、科学的训练之后才来到周口店这个特定地域进行田野工作的。

周口店两年的发掘，已使丁文江、翁文灏等科学界前辈清楚地意识到，由中国人独立主持发掘这具有非凡意义和影响的遗迹的时代已经到来，安特生等人由此而获得的荣耀的光环也将照耀到中国人的身上，并从此和中国人永久相伴。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境和思考，周口店的发掘主持重任，才落到了年轻的裴文中肩上。尽管此时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仍具有国际合作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1929年4月，裴文中走马上任，他指挥民工在1928年发掘的地方，由第5层起继续向深处发掘。早在安特生刚刚意识到周口店具有发现古人类的可能时，他就极富经验地提醒师丹斯基：“在冲积地层中寻找人类遗迹，就像在德国公园寻找一枚失落的针，但在同时期的岩洞中寻找古人类，就像在皇家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寻找一根针。后者无疑也不容易，但比在公园中寻找希望还是大得多。”

裴文中自然知道安特生所指，他决定在这个发掘区一直挖下去，直至挖到含有化石堆积的最底部。意想不到的是，第五层却异常坚硬，出现了“凿之为铿锵之声，势如钢铁”的局面。

在一番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裴文中毅然决定，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尽管这个手段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大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以“暴力”手段揭开岩石，似乎别无选择。

势如铜铁的第五层岩石最终未能抵挡住烈性炸药的威力而逐渐崩裂瓦解。堡垒已经攻克，后来的发掘便显得格外容易，发掘人员轻取了第六层和第七层的堆积物，随后又连克两层，即第八层与第九层，清晰的地层图已构画出来，许多湮没难解的问题已变得明朗起来了。

发掘的遗迹显示出极其浓厚的地层，从洞顶到空隙底部，不少于35米。而从整个洞穴堆积的内容看，从底部到顶部都属于同一地质年代的动物群。

尽管这个时期的发掘，裴文中和他的助手以及所指挥的工人们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客观的成绩，但仍未超出安特生和步林发现成果的范畴。远古人类像是故意挑逗一群后生，而那令后世人类极度敬仰的远古祖先的身影，在世纪的光照中总是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令虔诚的敬仰者越发感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桃花扑面，芬芳溢鼻的春天过去了。

雨水四溅，山洪泻流冰雹四散的夏季过去了。

漫野红遍，丛林尽染的秋季过去了。

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大雪一阵接一阵，周口店群山一片惨白。

周口店的发掘依然没有大的突破。

其实，这时的裴文中们已经有了足以震撼世界的突破，可惜他们自己并未察觉而失之交臂，以至使历史的记载者不得不暂时弃书搁笔，和发掘者一道在凄冷的寒风残雪中，再苦苦等待近一个冬天。

当发掘进入到第八层时，一个破碎的头盖骨已经伴随潮湿的泥土走向了新的世界。尽管头骨已经碎成许多块状，倘若及时发现并粘结起来，仍不失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但没有一个人发现。直到1930年春天，一个技工在北京的研究室里修理化石标本时，才发现了这件四周裹满泥土的头盖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个遗憾曾使年轻的裴文中垂胸顿足，以至落下了悔恨的泪水。直到1934年他还在著作中念念不忘地写道：“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外面还有很厚的泥土包裹着，以

致在现场未被发现。我很明白他们在维护我的短处，掩盖我失查的罪名，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

周口店的发掘仍在继续。随着深度不断延伸，堆积物的体积也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当深度已进入地下40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身影。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却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的出现，意味着北京人的大门轰然洞开了。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三个工人手持蜡烛相继进入洞内，极富远见的裴文中当然不会错过眼前的机会，他很快找来绳子拴在腰上，点燃一根蜡烛攥在手中，对后面的人说：“将绳子这一头坠住，我下去看看。”

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

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扑扑跳荡，辩不清洞的长度，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裴文中的全身。他摸着洞壁大约在深入到五、六米的地方，看到了前面的几个晃动的人影。他凑上前来漫漫将弓着的身子蹲下来仔细察看。他惊奇地发现，无数远古动物的化石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面对眼前一切，裴文中那颗扑扑跳动的心被极度的兴奋所替代，这种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地猛地起身站立时，头撞在洞顶坚硬的石壁上，一声闷响，使他差点昏倒。

他在工人们齐声叫劲中顺着绳子爬出洞穴。多少年后，跟他发掘的工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走出洞口时的场景——裴文中一手捂着凸起血包的头，脸上荡漾着显然是高度兴奋才有的红晕，语言极不流畅地说：“我……我发现了祖先，不对，是……是我感觉到将要在这里发现……发现我们的祖先。”

像当年的安特生博士一样，裴文中对洞穴内存在人类祖先的预感，再一次被验证。只是，它的验证要快得多，就在第二天。

这是一个世界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史上都无法忘却的日子——1929年12月2日。

从洞口开始的发掘已向里延伸到10米，尽管裴文中和其他三人手持的四支蜡烛仍在不住地燃烧、跳动，但洞内却越发昏暗，残淡的光亮使四名发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下漫无边际地飘荡，惨白的太阳在西方的山顶悄悄从云雾中钻出，向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天就要黑了。

越发黑暗的洞穴深处没有人讲话，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只有这样的响动，才显示着这阴暗的深处拥有高级生命的运动。

突然，裴文中大喊一声：“这是什么？！”

几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工具向裴文中围拢过来。

一豆烛光照耀着洞底，映射着一个凸露的圆圆的东西。

“像是人头？是人头！”裴文中再次喊叫起来。

奇迹出现了。匿藏了50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露出了他的面庞。裴文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身心的颤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我竟一时不知所措。”

发现的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要想取出，首先应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裴文中与几个技工将这一切做完后，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由于头骨已演变成化石，撬动中骨盖破裂，无法完整地抱出洞穴。来不及找合适的包裹物将头骨盛下，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不会想到这一人类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

裴文中急中生智，迅速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藏起来，小心地弓腰走出洞穴。

“挖到宝贝了，这会儿是真正的宝贝儿……”和裴文中一道走出来的技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边的人群争相传播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众人闻听，目光唰地投向裴文中手捧的棉袄。

“挖出了啥子宝贝儿？快让咱看看。”民工们围住裴文中，七嘴八舌地叫喊着，眼睛放出奇特的光，如同一场夺宝大战的前奏。

“是人，我们挖出了一个人……”未等裴文中说话，一起从洞穴走上来的技工乔德瑞作了极富悬念和诱惑力的回答。

“还活不活？快拿到村下扎一扎！”众人在诱惑力的驱使下，纷纷拥将上来，用手扒裴文中怀中的棉袄，欲对挖出的“人”进行施救。

裴文中急忙转了个身，声音颤抖地说：“不要抢，人已经不活了，咱回去好好看，好好看……”

“走，快回去，快收拾东西回去。”民工们吆喝着纷纷收拾发掘工具，跟随裴文中呼呼隆隆地向山下涌去。

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夜色包围中格外肃穆空旷。风已停歇，雪下得越发紧起来，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裴文中怀抱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向前走着，走着……

许多年后，裴文中对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我象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更大得多。尽管是寒雪飘洒的傍晚，但我只穿了两个褂子的身体，没有感到一点寒意，只觉得心在呼呼地跳，两腮和耳朵根热辣辣的。怀抱头盖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着，思绪不住地翻腾。多少人的向往、梦幻和追求，今天终于付诸实现了。远古的祖先就躺在我的怀中，实实在在地躺在怀中，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呵！想到这里，我的眼窝开始发热、发烫，最后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裴文中来到山下的办事处，也是他工作的指挥部兼宿舍，打开包裹着的头盖骨，让蜂拥而上的民工兄弟们一一观瞻。裴在后来撰写的回忆中说道：“发见了猿人头骨，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我高兴了，如何令北平人们知道呢？如何使他们也高兴？我先决定派专人去送信，写好了信，令人次日早晨返平，专呈翁所长。”

裴文中静下心来，奋笔疾书，信中写道：

翁先生：

今天交了好运，我们在原发掘地点第九层下边发现一个洞穴，经发掘得一猿人头盖骨，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我在现场就把它取出并安然无恙地带回。待稍作处理，我即携此头盖骨返北京面交。

翌日一大早，送信人怀揣这一喜讯向北平奔去。裴文中回忆说：“送信人走后，我又觉得他们到晚上才能看到信，天时晚了，翁所长未必能通知关心周口店事务的几位朋友。于是我于三日早又打了一个电报给步达生先生。文曰：‘（衔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下略）。’因为猿人不是人，故我说他颇似人。”

与裴文中料想的结果大不相同，北京方面接到消息后，在一片哗然中竟没有人相信这位刚走出校门的小伙子会交上如此的好运。“如果说发现了头盖骨，肯定不是人而是其它动物的，就裴文中的知识和才华，他可能还辩不清人与其它动物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确切地说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有为数不少的科学界资深人士做出了如此结论。

即是极富远见并对周口店发掘抱有极大希望的步达生，在接到电报后也懵了。他希望其有，又恐怕其无。希望其真，又怕裴文中走火入魔，谎报军情。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给安特生的信中可以见到：“昨天我

接到裴文中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将把他所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这个结果不是幻想而是真的。”

北京的喧哗与骚动，摇头与嘲讽，裴文中当然不会知道，在周品店那间冷清的屋子里，他正紧张而有序地做着如何把头盖骨安全运送到北京的准备。

几十万年的造化，将头盖骨变成化石的同时，又富予了它一个婴儿般娇嫩的外表，整个头盖骨既酥软又潮湿，稍一震动就发生爆裂。如此一种状况，显然无法安全无损地带回北平。经过反复思考，裴文中大胆做出先用火将头盖骨慢慢熏干，待严密包扎后再送往北京的决定。如此处理方法这在当时是前无先例的。

一堆柴火在泥做的盆中劈哩啪啦地爆响、燃烧，碳头越聚越多。待木柴全部燃尽后，裴文中将头盖骨捧在手里在死火的上方烘烤。

头盖骨在逐渐的干燥中开始硬化，初试取得成功，裴文中大喜。之后，又在变硬了的头骨四周糊上五层棉纸，棉纸外再加石膏和麻袋片，经水浸泡后再度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上的一切和头盖骨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干燥而坚固的整体后，方停止操作。

地球人类的震撼

12月6日清晨，裴文中宣布1929的周口店遗址发掘到此结束。送走民工，他将头盖骨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裹起来，外面捆上褥子和线毯，连同其他生活用具一道背下山，登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

全身呈筛糠状的汽车一路颠簸驶往北平古城，当行至西便门时停了下来。当局规定，凡进城旅客必须在此接受例行检查，裴文中将行李从车上扛了下来。

“将行李打开。”面前的警察颇不耐烦地下达着命令。

裴文中递上证件，然后从身上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块小型化石说：“我是在周口店作人类化石发掘的工作人员，这个包里捆着的是极为珍贵的化石资料，没有其它东西。”

“那也得打开。”警察抖动着显然是被寒风抚摸得不太爽的身子高声嚷道。

“里边的化石一碰就碎，还是不打开吧。”裴文中请求道。

“不行，叫你打你就打，少啰嗦。”警察缩了下脖子，见裴文中仍无开包之意，上前对着行李不怀好意地踢了一脚，然后亲自动起手来。

包扎头盖骨的包裹很快显露出来。

当面前的警察挥手欲粗暴地揭开糊在头盖骨外部的麻袋和纸张时，年轻气盛的裴文中忍无可忍，他猛地上前攥住了对方的手腕，满面愤怒地喝道："你要是坚持检查，就先把我拘捕了吧，人和行李一起押送到城里……"

警察抬起头，先是颇感意外地瞅了裴文中一眼，尔后悖然大怒，当场给了裴文中一拳。裴文中一个趔趄，摇晃着身子顺势给了警察一个响亮的耳光，接着二人伸胳膊弄腿地扭打起来。不远处一个当官模样的老警察，忽见前面动起武来，迅即走过来将二人拉开，先是教训了警察几句，较和气地问了裴文中的情况，然后一挥手，示意放行。

裴文中顾不得与面前交手的那位年轻警察计较，迅速扛起包有头盖骨的行李登上汽车，安全进入北平城。

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当步达生用别针一点点将包裹着头骨的硬土剔掉时，这位杰出的古人类研究专家抱着头骨怔怔地看了十几分钟，由于高度兴奋，抖动的双手差点将头骨摔在地下。

"没错，是人的，是人的。"步达生两眼放光，站身拍了一把裴文中的肩膀，高声说道："小伙子，感谢你，整个世界的古人类学家都应该感谢你的伟大发现。记住，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可以留传后世了。"

裴文中走后，步达生按捺不住激动的欲火，他连续给国外科学界朋友写信，报告了这个足以令自己的同行震惊和羡慕的消息。12月13日，他在给英国著名解剖学家、自己的老师艾利奥特·史密斯（G..Elliot Smith）教授的信中写道："1929年周口店的工作再次以一个壮丽辉煌的顶峰而结束。12月2日，主持野外工作的裴文中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的成年人头盖骨。他在现场就把它认出来并亲自细心地把它挖出。12月6日，这个仍然带着野外包裹的头盖骨带回北京的时候，还透着热温。我打算在给您和基思(Arthur Keith)教授发出的圣诞贺电里，报告这个将于12月28日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好消息。如果您能够将这个消息传给史密斯·伍德沃德(Smith Woodward)、格雷戈里(W.K.Gregory)、沃森 (Watson)等诸位博士，我将感到荣幸……"

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周口店发掘所达到的顶峰地位，它使一切怀疑和贬低裴文中取得成就的人都哑口无言。

12月28日下午，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应邀到会的除科学界的大师名流外，还有中外新闻界人士。裴文中在会上

作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报告。正如预料的一样，这一创世纪的伟大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当时的北京《晨报》以巨幅标题作了如下报道：

五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被唤醒

周口店发现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

昨日下午2时，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辞，裴文中、步达生、杨钟键、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出席演说。裴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谓北京西南周口店曾掘得“北京人”头盖骨一个，已变成完整的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的化石，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是亚洲发现第一块远古人类头骨，此种发现足令世界震惊。毫无疑义，是裴文中氏唤醒了亚洲最古老之人类，并把它从沉睡的洞穴请出来。

作为最初之研究成果，步达生博士断定这位先人可能属青年和少年间之年龄段，性别尚未确定，极可能属男性。对此位“北京人”头骨之研究，极大限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人类早期历史之认识。注意到“北京人”头骨之厚度，可联想到英国南部“曙人”之厚头骨。但在其它部位，如厚眉骨及低前额，“北京人”又和爪哇的特里尼尔人有密切之关系。步达生博士仔细比较两种猿人，揭示了二者之基本区别。爪哇之特里尼尔人进化较高级，此并非对某一民族而言。北京人有混合原始人与现代人之特征。步达生氏总结其特点言：北京人属发展之类型，接近原始人。此不仅属尼安德特人、南非人种之原型，亦属现代真人之原型。

这一创世纪发现，使整个人类早期理论渐已成熟……

与此同时，国外报纸纷纷登载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并以“地球人类的震撼”、“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道闪电”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概括了头盖骨发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北京人’骨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为之一新。”

青年的裴文中以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而把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推上了辉煌顶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项事业已走到终点。几乎每一位关心周口店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充溢着奇迹的山洞里，一定还会有与之匹敌的惊人发现等待现代人类去叩访。

发掘理所当然地还要继续。

1931年春，当裴文中和新到周口店协助工作的贾兰坡带领民工在清理洞中的松软堆积时，意外发现了一层含有丰富石英碎片的地层堆积物。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裴、贾二人的注意，遂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发掘。两个月之后，在周口店一个叫鸽子堂的地方，又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石英层。

经过近一年的发掘，从发现的两个地区中，收集到不少于两千块石英碎片和十块不属于洞中的石头，五块绿色砂石、三块褐铁矿结石。另外发现了两块并列着的燧石和各种颜色的石英片。所有这些发现，几乎和人类的骨骸，猛犸、鹿、三趾马等动物化石在同一地层中找到，而那些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数没有争议地显示出加工和使用过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胆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远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结论。

1931年秋，法国著名的史前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H.breuil)教授，在详细考察研究了周口店遗迹的化石后，这位杰出的学者在完全接受了裴文中所作结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一些兽角和骨头也有明显人工加工过的痕迹，而这些发现同石器一样，都可能成为人类祖先的工具”的结论。

当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时，他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设成用以切割兽肉的工具，才有了进一步推断地层中可能有人类遗存的结论。十年之后，安特生假设的事实终于被科学发掘所验证。

几乎就在同时，裴文中、步达生、步日耶三位天才的学者，根据周口店堆积层中烧焦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开始用火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无可质辩的事实，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

石器、骨器与用火遗迹的发现，使周口店的发掘又步入了一个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这伟大的发现中再度辉煌。他在世界人类尤其是中国大众心中的声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后，中国的青少年仍然从历史课本上读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用火遗迹这一伟大发现的文字，裴文中也伴随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而被后世人类所铭记。

第四章 山雨欲来

达尔文的幽灵潜入远东大陆

1831年，自小被学校和他的父亲看作愚笨无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1882年），毅然弃家离开英国本土，自费踏上了一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Beagle），开始环球旅行考察。五年后回到家乡，自此开始对考察成果进行总结。经过 2 2 年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和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 1859 年 11 月 24 日 出版了足以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籍此创立了著名的进化理论。这一以亘古未有的全新的进化观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变化而来的学说。对千百年来根置于人类心中“上帝创造人”的学说以灭绝性地打击。《物种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的长空炸响了撼天震地的惊雷，瞬间使当时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乱。达尔文由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非难，并被骂为“一个极端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疯子。”

然而，这个“疯子”所创立的学说，却受到了当时两位哲学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称其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它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之后，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使原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学的西方统治阶级，越发感到恐慌和不安。他们以极度的愤怒、彻骨的仇视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这些理论在一切领域中的流传和影响。西方世界狼烟四起，迅速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搏杀。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阿布维尔实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作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 的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涅地区埃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Dr. Eugene Dubois)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爵士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它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

所有这些发现，无疑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抵毁。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也许没有必要提醒读者，这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的歧途。德国的“学术权威”、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这一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学说，经受了暴雨雷电般的摧残、打击之后，最终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随着考古学界对史前人类历史的不断发现而逐渐跃出泥潭，开始为具有科学客观态度的世界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开始着手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于1899年以《天演论》的书名出版。这部被视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功之作的皇皇巨著，使绝大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在西方争论不休的“进化”概念，比其它科学概念更早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18年7月，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他的传播导致了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

一系列“北京人”骸骨及其遗迹的发现，客观上为“进化”理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事实根据。它以无容质疑的客观存在，使西方“进化”的反对派不得不迅速闭上诋毁、谩骂的嘴巴。因为，在所有先于尼安德特人的古人类发现中，正如众所周知的是在宽阔的冲积层内，这样的地层结构对于人类遗迹只能渴望偶然的发现。当西方“进化”与“反进化”的思想搏杀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时，考古学家企望能在特里尼尔、海德堡、皮尔唐等地发现更多的化石，但最终收获甚少。欧金·杜波艾斯在特里尼尔发现被命名为“爪哇直立人”的骨骼化石后，希望能在这里有更大的发现，但所有的努力只是捡到了一只牙齿。而在海德堡和皮尔唐几乎没有一点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了“进化”派的论据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事实上，在英国发现的皮尔唐人，确实是一个丧心病狂的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世纪骗局，这个骗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科学界揭穿。

周口店的发现却与之大不相同，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山野洞穴中，发掘出大量的人类牙齿和下颌骨，以及后来被定为“人类工具”的石英碎片和已绝迹的上万块动物化石。尤其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活灵活现的事实，让“进化”的反对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并开始确信，“猿人”的确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

近一个世纪来，学者们一直乐此不惫地探讨“北京人”及其遗迹发现的学术意义，却忽略了它对于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北京人”的发现在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和达尔文学说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同时，在客观上为这些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观念更快、更普遍地深入到大众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北京人”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达尔文的学说，如此迅速地被人类所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学说仍属一介书生之见，同样有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与违背天地人事的缺撼。

神秘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然而，就在周口店发掘出现第二个辉煌顶峰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已发生了急剧变化。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奉军首领张学良严厉命令不准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退入关内，沈阳沦陷。随后的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膏药旗在白山黑水四处飘荡。这就是中国人早已熟知的“九一八”事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4月，占

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州。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战略中心北平、天津被日军三面包围。

1936年，日本军队向华北大量增兵。对中国内陆形成乌云压顶之势。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在这乌云密布、刀光剑影的政治风云中，跨越了近7个年头的艰难历程。尽管开始几年的发掘一度走进了低谷，并令当时的多数学者心灰意冷，甚至感到绝望，但最终还是迎来了中外合作计划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辉煌。

1936年11月15日，继裴文中之后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裴文中于1935年赴法国留学），在一天之中连续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头盖骨。这是继裴文中举世闻名的发现之后第二次发现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也是周口店发掘在徘徊了6年之后，几乎是在一无所获的萧条境况下，一次具有历史的意义的重大突破。两个头盖骨同时出现的事实，再次让关注周口店发掘的悲观者看到了灿烂前景。

尽管战争的烟云几乎遮住了人们对其宏观世界事物，特别是科学文化关注的热情和视角，但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却例外地得到了世界性传播，当时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英国伦敦弗利特街110号国际剪报社于1937年6月向贾兰坡提供的信息，该社拥有欧洲、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地区发表此消息的剪报达2000条。如此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信息传播，就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是任何一项其它考古发现所无法匹敌的。

就在这个消息于世界广为传播并使科学界为之震动之时，11月26日，贾兰坡再度从周口店那个近似魔术师道具般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它的发现，无疑于火上加油，使沉浸在惊喜中的科学界几乎陷于迷狂。当时在协和医学院的德国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对三个头盖骨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

“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因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发现。10月下旬曾发现猿人左下颌骨一面，并有5个牙齿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内，又发现猿人头骨两具，及牙齿18枚。26日再发现一极完整的头骨。对于这次伟大的发现，我们不得不感谢贾兰坡君。”又说：“此三头骨，均为成年人的遗存，且保存得都很完好。前两个，一个较大，一个略小，大的属于男性，小的属于女性。头盖部分，虽然完整，但颅底部不齐全。因为颜面部分及上颌骨，都有保存痕迹，可重示其原来的面目。不幸的是，保存的颜面骨骼，由于震压太碎，工作实感困难…… 最近找到的小头骨

和春季发现的头骨碎片，全部可以解释爪哇猿人的问题。爪哇猿人很久就被认为是大长臂猿的化石，但因头骨的性质与北京人相同。由此可见爪哇猿人并非它物，即与北京人相类的一支人类。换一句话说，所谓爪哇猿人，即为北京人演化过程中的代表。然而这次找到的头骨，男性比女性高得多，并且很近安德特地的人类，所以演化过程，似从北京人进化到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现代人类。”

最后，魏敦瑞断言：“由已有的头骨和下颌看起来，在未变成化石之前，已经破碎，此种特征，可以认为北京人当时彼此互相杀害，剖弃四肢，将人头积存洞内，就现在所得材料和研究，对于人类演化过程完全可以断定，惟对解决上述问题尚嫌不足，若将来有新的发现，也许可以圆满解决……”

作为新生代研究室的创始人步达生自从有幸研究了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约8岁孩童头骨之后，一直渴盼有新的发现，但总是迟迟未能如愿。想不到就在他的欲望之火渐渐冷却之时，在11天之间，竟连续发现了三个完整的头盖骨，步达生为此受到的心灵冲击和感受是可以想象的。

当惊喜交加的科学界欲挽起袖子准备在周口店发掘与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彻底解开人类进化之谜时，越来越险恶的战争风云，使他们不得不含恨放弃这个辉煌的梦想。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

中日交战的枪声惊碎了几乎所有关心周口店发掘事业的科学家的美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项具有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艰难地持续了十个年头之后，终于降下了那曾照耀全球的帷幕。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建议，周口店发掘人员分批撤回北平。主持人员贾兰坡携化石标本率大部分科技人员先期回城，发掘场地只留几名当地雇用技工看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随着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溃退南下，周口店龙骨山发生了一场规模异常的血战，交战双方是日本操纵的伪军与华北抗日自卫军。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乡村寺庙以及寺庙总院、后来成为周口店发掘指挥部的几间大厅，全被日伪军所占，并成为阻击抗日自卫军的工事。山野中埋有“北京人“遗骸的洞穴，也成为日伪军存放弹药、食品和进行作战的天然屏障。龙骨山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孤寂与平静，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谷，喊杀声和哀嚎声在山野回荡。整个龙骨山硝烟弥漫、热血荡漾。寺庙、土墙在炮声的轰鸣中坍塌了，盛藏人类祖先的山洞在战火中崩裂。战争给这块圣杰之地带来了空前的劫难。

1937年11月，周口店地区的战事处于暂时的缓和。华北抗日自卫队撤出龙骨山，进入大石河一带，日伪军抓住这短暂的喘息机会，进行补充休养。就在这个短暂时刻，发生一件看似平常，但对日后“北京人”头盖骨遗失一案却不容忽视的事件。

11月7日，三辆汽车满载持枪荷弹的日本兵驶出北平城，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停下。数十名日军护卫着两个身穿便装，具有学者风度的日本人，来到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山洞前。便装人先是打量了一番山洞的四周，接着掏出皮制圈尺测量山洞的长宽距离，然后用相机几乎拍下了一切可拍摄的地形地貌和古生物堆积层。这二人就是悄悄来华搜集“北京人”情报，并参与了头盖骨失踪案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东京帝大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四年之后，日本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正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开始了搜寻“北京人”化石的行动。

箭在弦上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尽管许多爱国将士英勇抗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而日本的全面侵华，又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以及在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权益。英美与日本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剧。

1938年之后，由于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即将破产。为摆脱内外困境，达到“死中求活”的目的，日本军阀决定把战火推到东南亚的丛林岛国。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火突起，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术袭击波兰。面对骤变的世界风云，日本再也按捺不住全面侵略的野心，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1940年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鉴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决定携手并肩，荡平一切敌对势力，而开刀祭旗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

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下令例行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这一“威慑力量”进驻夏威夷珍珠港。

1940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亚、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一看事情不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1941年1月23日，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严峻而复杂的局势下，以“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在美利坚国土上。当他走下飞机弦梯时，立即对簇拥而上的记者宣布：“不管日美两国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能够以友好合作的态度予以解决，日美双方没有任何理由动用武力……”

野村吉三郎的出任，轰动了整个世界。日本报纸借此大肆渲染，称其为“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开创了日美关系再度谅解和友好的新纪元。”美国报纸也信以为真地纷纷以头版通栏标题刊登野村抵美宣布的消息，并盲目乐观地预言：“日美关系将揭开新的友好的一页。”

1941年3月8日，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言来语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显然，日美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双方引而不发，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对方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暂时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

正当日美谈判双方争论不休之时，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十几天，德军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长驱直入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日本军阀面对瞬间骤变的局势，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爆发了一场“南进”还是“北进”的争论大战。最终的结果是，主张“南进”的实力派获胜。

日本决定孤注一掷，在英美的南洋势力范围内大开杀戒了。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战略资源的行动。日美谈判宣告暂停。

作为对日本人的回敬，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一切资产。8月1日，再度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如果日本的石油得不到进口，在两年之内库存就会消耗殆尽，具有高强度杀伤力的武器如军舰、飞机等将变成一堆废铁。日本人见此情形，杀气骤增，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公开发表讲话，锋芒毕露地嚷道：“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

一个月之后的9月6日，日本东京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海军军令部草拟的一项重大决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明确提出了“帝国为确

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日美外交谈判，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立即采取对美（英、荷）开战行动。”

10月下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之后，终于确定了对美战争的具体方案……

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

箭在弦上……

11月2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赫德上将，接到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驻屯北京、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作好撤离准备，共赴菲作军事集结。”

美国海军自1927年派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后，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直至刀兵相见。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方针，驻华美军虽处于战争旋涡，仍能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伤害地平安度日。

现在，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使远在异国它乡的美军官兵越发惊恐不安。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作着作各种不同的推测，密切关注着大洋那边关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

显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7月24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后续部队直接交锋。

血战在即，来不得半点犹豫了。驻华美军立即行动起来，作着迅速撤离的准备。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范盤轮总统号、麦迪逊总统号、哈立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承载美军撤离任务。

11月5日，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

《要领》称：“发动武装进攻时间定于十二月初，陆海军应迅速完成作战准备……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时以前获得成功，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

此时的日本方面，在战争狂人的操纵下，遵循了这样一条宗旨：“今后和美国的谈判是伪装外交，一旦日本完成作战准备，即行开战。”

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事集团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的当天，日本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相继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命令：

大海令第一号

兹奉敕命令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一、帝国决定为自存自卫计，预期于十二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并决定作好各项作战准备。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进行所需之作战准备。

三、有关具体事项，听候军令部总长指示。

军令部总长 永野修身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联合舰队命令

联合舰队在对美、英、荷作战中之军事行动，应根据附件规定进行。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于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

11月20日晨，美海军驻华第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下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全部装厢，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11月21日，美驻华使馆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

同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作战指令：“机动部队务于11月26日自单冠湾出发，竭力保持行动隐蔽，12月3日傍晚进入待机海域并加油完毕。”

11月22日，日本机动部队集结完毕。各舰队司令官分别向机动部队舰员传达了空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11月24日，日本陆海军大批部队从上海搭乘由四、五十艘运兵船组成的船队，离沪南驶，故作赴东南亚军事集结状，以掩人耳目。

11月25日，华盛顿白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西亚或泰国，美国应以什么方式进入战争？

11月26日晨6时30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6艘航空母舰，盛载400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岛号2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11艘驱逐舰、3艘潜艇和8艘油船共33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珍珠港冲去。

同日，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远东形势的报告》，并着重提出了两个观点：

判断日本将南进，特别是将入侵泰国。

为对抗日本的上述活动，美国在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之前，尽可能避免对日作战。

罗斯福总统指令向当地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的陆军部队发布“战争可能随时发生”的警戒命令。

11月27日，美驻沪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300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公共汽车公司特派的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曼马勒号轮驳。按原订计划，当官兵登上轮驳后，要举行告别仪式，但此时整个天空大雨倾盆，仪式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驳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逊总统号轮船。

下午2时，麦迪逊总统号轮船解缆拔锚，离开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11月28日，美驻沪海军联队第一队450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需抵达秦皇岛运载驻屯平、津美海军陆战队官兵，然后驶往菲岛。

11月29日，美驻华扬子江舰队司令葛拉斯福少将，乘旗舰吕宋号，率扬子江舰队在夜幕中悄然驶往菲律宾群岛。

12月2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消息：“驻屯北京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立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日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形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京、津、沪美侨，速

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通告发出，意味着大战真的到来了。北平、天津、上海及其它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此时的华东、华北，寒风呼号，雨雪交加。凄风苦雨中，告别的人群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哭声、骂声、哀叹声，此起彼伏，交织一片。英美之外驻华的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丹麦人，也因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法国人则因为大多不愿归顺维希政府，也暂时寄人篱下，漂泊在外。俄国人则由于西伯利亚大铁道被德国掐断，同样有家难回。于是，无数的撤离者整日哭丧着脸在大街小巷四处游荡，探听信息，密切关注战争的态势和自己祖国的命运，同时也纷纷谴责法西斯的暴行……

世界各地，狼烟四起。中国东部，一片混乱。

在这股混乱与大骚动中，存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美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又将何去何从？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

“北京人”何去何从

随着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北平落入日伪之手，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大多数机关、团体、学校，黯然撤出，迁往西南地区。淞沪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一退再退，地质调查所又相继迁往长沙、昆明，直至退到重庆北碚才算立稳了脚跟。

设立在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及其人员，没有随地质调查所搬迁，因为“协和”暂时还属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人、财、物是不受日本人干涉的。

但此时，已很少有人能够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氛围中安心搞研究了。尽管大多数科学界人士还在上班，但研究的课题却从科学中偏离开来，开始关注战争动态和发展趋势。几乎每一间办公室所谈论的话题，都是战争、战争、战争。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化石的安全。如果一旦日美战争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将难以预料。

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北京人”头盖骨这一人类至宝。时已离开中国地质调查所，晋升为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对“北京人”的命运给予了热切关注。1941年1月10日，翁氏与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共同致信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新生代研究室新接班的主任、美国人魏敦瑞，明确指出：“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 按翁文灏的设想，“北京人”的安全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有如下三条：

在北京找个秘密场所把北京人藏起来，从而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把北京人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把化石全部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

但是，“北京人”化石却迟迟未能转移。因为这三条看似可行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如按第一条实施，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终归在沦陷区内。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美国在华的一切人与物，将会任由日本人宰割，而狡诈的日本人会不惜一切探寻“北京人”的下落，并直至从某个秘密场所

将其搜出。

第二种方案的可行之处就在于，若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安全暂时有了保证。但是，在中国东部国土尽丧，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要辗转千里甚至万里予以转移，沿途的安全无法保证，很可能凶多吉少，最后落个鸡飞蛋打，使“北京人”落入日伪或土匪兵痞手中遭到毁坏。

相比之下，第三条方案更具可行性。只要将化石运往秦皇岛码头，在那里装上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就能平安抵达美国。但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1927年2月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因为在此协议收中明确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一切化石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面对三条各有利弊又有缺陷的方案，与其相关的翁文灏、胡顿、魏敦瑞等中美双方人士一直举旗不定。时间一天天过去，“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越发显得突出和刻不容缓。

1941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要离开北平撤往美国，翁文灏得此消息，致电胡顿与魏敦瑞本人，请对方按他此前提出的第三条方案转移“北京人”，并由魏敦瑞携带出境。尽管这个决策违背了协议规定，但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翁文灏的设想遭到了胡顿的反对，他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

极度精明的魏敦瑞对这一决定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以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所以，我认为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还是把化石放在原处，也就是说要牢牢地把它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

1934年3月15日，“北京人”研究的第一位科学家步达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周口店出土遗物时不幸去世，这位世界一流的古人类研究者的接班人一时成为难题。经丁文江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目的是选择步达生的接班人。最后国际委员会一致同意由美国科学家魏敦瑞为继承人。于是魏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继续从事周口店出土遗物的研究。

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以及与“北京人”有直接关系

的负责人的意见，翁文灏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高层不得不再作慎重考虑。恰在这时，重庆政府和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复电，不同意“北京人”化石运出国外，如果情况没有更大的变化，化石仍存放新生代研究室。

尽管魏氏拒绝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并提出了暂留北平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与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不谋而合，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的紧张状况，使他预感到“北京人”很可能在劫难逃。这一轰动世界的人类宝贵的财富，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遭到丧心病狂者的毁灭。于是，他极富远见地将中国助手胡承志叫来，严肃而略带忧伤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日子，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大量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而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唯一可做弥补的是，现在你立即将北京人头骨化石做成里外都有的脑壳模型，然后寄给我。当然，我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的那一天。为了‘北京人’及我的研究事业，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候你的佳音。”

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作最后告别，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的告别会上，魏氏以极其复杂的情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道：“感谢各位前辈和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我就要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人类都应该感谢他。

魏敦瑞走后，由裴文中继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从事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此时的裴文中已不再是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的毛头小伙了，他于1935年夏赴法国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与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室留学，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攻读，并于193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不仅掌握了先进的西方田野考古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以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古人类的方法。凭他的声名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于他。

遗憾的是，此时的裴文中远没有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幸运了。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使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危难之时，能保全“北京人”化石及其它发掘之物，就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艰难的抉择

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凶险，早已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虽有兴趣但无法进行下去的科学界人士，开始无目的地成群结队游动起来。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存放的“北京人”，一时成为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关注者中，有两个日本人幽灵似地夹在其中，瞪着狡诈、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窥探。几乎每个星期，两个幽灵都要光顾一次新生代研究室。

终于，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注意，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来参观的动机时，想不到两人却捷足先登，找到了裴文中。

这两个人正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暗中到周口店窥探“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我们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尚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参观访问。伟大

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先祖，我们为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能在您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从事一段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将感到莫大荣耀……”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辞后，终于表示他的目的。

裴文中望着面前两个小个子日本人鬼头鬼脑的样子，一时没有吭声。他知道在这风雨欲来的动荡时刻，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决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其真正目的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刺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想到此处，裴文中断然拒绝了二人的要求。

两个小鬼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但并没有放弃与“北京人”的纠葛。事实上，日本人插手“北京人”，才刚刚揭开帷幕。

当天晚上，裴文中就向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报告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研究室的情况，并指出其险恶用心。同时致信重庆的翁文灏，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作了汇报。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复杂，‘北京人’化石必须尽快想办法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翁文灏在回信中再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让裴文中与胡顿联系，尽快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

“这一时期来，我也有这种预感。但究竟怎么才能防止万一呢？”面对裴文中焦虑不安的神态，胡顿问。

“很显然，化石是不能按第1种方案留在北平，看日本人的来头，即是把它藏在老鼠窟窿，他们也会找到的。”裴文中望了一眼胡顿，接着说：“我看还是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第2和第3种方案中选择一个。”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胡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并请裴文中具体办理。

电文发出后，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用的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被盗。许多年后，胡承志回忆说：“每天魏敦瑞用‘北京人’作研究，自己也用真品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他做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店铺为他担保。

时间一天天过去，气候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严酷的冬天

到来了。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恶化，“北京人”何去何从，也就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最后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北碚，呆呆地望上一会儿，渴盼着对方的传来的消息。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杳无音信。处于烦躁焦虑中的裴文中内心又陡然增添了一种无奈和惆怅。

这个时候身居重庆的翁文灏，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与党内党外勾心斗角的人事纠葛，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至极。尽管处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官宦地位，但翁文灏还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使命感，为“北京人”的命运而殚精竭虑地奔波忙碌。当他收到北平发来的电报后，便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进联系，就“北京人”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多次电函联系，商讨对策。由于局势混乱，战争迫近，数月之后，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驻美大使胡适表示对此竭诚相助，力保“北京人”赴美后的安全与主权不发生变故。由于“北京人”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其去留关乎国家荣誉，翁文灏本人无权做主，必须得到最高当局批准方能成行。因而，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介公委员长钧鉴：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可虑，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为避免可能之灾难，请就迁移之去向明示为荷。

蒋介石接到电文，同样感到左右为难，一时打不定注意。“北京人”如同古代之九鼎，可谓镇国之宝。尝言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九鼎在国势命运中的重要程度，从“问鼎中原”等典故中可见出分量。 “北京人”的世界声誉和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力量，使颇为自负的蒋介石也不敢冒然行事，草率地决定迁移去向，此事只好悬而不决。待蒋介石回到重庆后，翁文灏再度催促此事，并表示：“北京人”危在旦夕，必须速作决定，并着手行动。否则“北京人”将不复见矣！蒋介石意识到此事已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令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自己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裴氏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内中因缘。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打成了什么协议，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忽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打成“北京人”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惟一一位最

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高潮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了解过这一段历史情况，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I和CadII。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下落不明。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

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

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动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I和CadII”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大约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着：一个是在他租住的小平房里或在街头呆着；一个是在东郊精神病医院呆着；一个是在监狱里呆着。那时中国人在协和的地位与这个小民工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北京人”后来会出事，所以也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一个人吃几碗干饭要心中有数，不知天高地厚是不能在世上生存的，在那种环境下，你让我装箱，我就装箱；让我送去，我就送去，这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不是我要过问

的了。不过，装完箱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把两个箱子里装的所有化石都列了一份清单，并在清单上写上A和B两个字，然后将这份清单交到了裴文中手上。

岳：你一说，我明白和理解了一点，做个中国人是够可悲的，做个中国农民就更可悲了，想到我们山东那个村里人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心里感到酸酸的。由此想到你们当初在美国人手下做事，真让人想到什么与什么之间的关系。看来要活在中国有两个不可缺，一是个岳飞、文天祥不能缺，一个是陈胜、吴广不能缺，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这样……。这些伤心的事暂且打住，等以后再讨论，“北京人”后来的情况又怎么发展的呢?

胡：听说博文将这两个箱子转移到了协和医学院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因为大家知道协和医学院的保险库是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即使是失火了，保险柜也不会受到损伤。协和医学院所有的重要档案历来都存放在里面，孙中山在那里治病的案例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不过，博文转移化石之事，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裴文中说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裴文中。他告诉我说，他碰到了王锡炽(南按：王锡炽为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院长)，王锡炽对他说，博文到办公室看见两个箱子后，当天就将那两个箱子亲自押送到了F楼4号地下室的保险库里。两个箱子在那儿只呆了一夜，就又送走了。到底送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估计是送到美国公使馆去了。

岳：既然您是听裴文中说的，而裴文中又是听王锡炽说的，而王锡炽也没有亲自参与其事，那么用什么来证明，博文确实是把两个箱子从他的办公室押送到了保险库呢?博文有没有可能将箱子弄到别的地方去了呢?

胡：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叫常文学的人用小车帮博文将两个箱子推到保险库的，常是博文办公室的勤杂工，当时他并不知道里面是“北京人”，只是稀里糊涂地押送就是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北京人”丢失的事，常文学被日本宪兵给抓去了，一顿鞭子加老虎凳什么的伺候，常文学才从日本宪兵的审问和提示中知道，他那天送的东西是“北京人”头盖骨。所以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的人并没不错。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我又听说博文被日本宪兵抓去审问时，也是这么讲的。

岳：可惜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博文是这么讲的?而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无法证实。

胡：因为当时与博文同时受审的还有美国公使馆的人，他们也被抓去了，知道博文是怎么说的。

岳：这个博文从日本宪兵队被放出来后，你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胡：抗战胜利后，我见到过博文并问起过“北京人”的事，可我一提起新生代，一提起“北京人”，他就神经质，全身打哆嗦，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岳：那么究竟有没有谁证明过那两个箱子确实是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和美国公使馆相关人员办了一些相关的手续?

胡：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就逃走了，后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岳：您逃走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呢，还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

胡：主要是怕“北京人”的事受到牵连。其实，日本人还没打进北平时，也就是说，我还在装箱的时候，就想着要逃走了。

岳：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到要逃走呢?

胡：这“北京人”一装箱，就意味着要运走。如果真的运到了美国，日本人打进北平后，找不着“北京人”，又知道是我装的箱，肯定要找我的麻烦。要是“北京人”没有运到美国，途中被人劫走了或者搞丢了，日本人要找我，美国人也同样会找我，我怎么说得清楚。所以我只有一走了之，先逃过日本人这一关。费了一些周折，我就跑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提心吊胆地躲了整整三年。

岳：在这三年中，为什么日本人要找的人全都找到了，单单就没找着您呢?

胡：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自从我将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亲自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办公室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北京人”化石。而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情况，我就更不知道了。不只是我，恐怕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了。

胡承志的回忆与早些年他亲自写就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稍有出入。尽管这些不同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了。——这就是，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箱子被胡承志送到博文的办公室后，或者说，当胡承志转身离开这间办公室，就再也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它的踪迹了。

从此，“北京人”紧紧地攥在了美国人手中。

第六章 战争状态下的北平

偷袭珍珠港

就在“北京人”秘密转移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已在雾气茫茫的太平洋海面上向夏威夷群岛疾速推进。

1941年12月4 日，日本出兵攻入泰国、越南境内。

12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直接以私函致电日本天皇，为挽救太平洋危局作最后一次努力，同时强烈指责日本军队进攻泰国的侵略行为；同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公开讲话：“美国如与日本作战，中国亦将对日宣战。”

12月7日凌晨1时16分，太平洋瓦胡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的响动，牵缚五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的骤然滚动，五艘特种潜水母舰如野马脱缰，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疯狂扑去……

就在庞大的日本舰队以极快的航速杀气腾腾地向珍珠港疾进时，美国华盛顿专门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讯谍报处，截获并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美大使野村的一封密电：

……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日本突然中断外交谈判，意味着战争即将爆发。情况万分危急。美国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立即向马歇尔参谋总长的办公室打去电话。但电话却无人应接，再往住所打，还是没人接听。此时的马歇尔正骑着他心爱的枣红马，牵着一只白毛黑斑狗，在阿灵顿公园愉快地进行星期日早晨的散步。透过公园的树丛，他听到了从附近教堂里传来的悠扬的钟声和赞美诗。

马歇尔散步归来回到办公室，拿起谍报处破译的电文刚刚瞥了一眼，顿时大惊失色。他霍地站起身，立即召来参谋长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各位，我敢断定，日本军队将在今天下午1时或1时过后，对我们开始发动攻击。我决定，立即向全军司令官发出紧急戒备的指令!”

“是!”参谋长转身奔向发报处。

此刻，日军南云舰队已行驶在了瓦胡岛以北230海里的洋面上，并收

到了从东京发来的密电：

檀香山街市平静，亦未实行灯火管制。大本营海军部确信：此举必成!

南云忠一司令立即指挥航空母舰转舵，逆风航行。飞行指挥所也当即下达了“起飞”的命令。于是，一架紧接一架日舰载机，在摇摆不定的飞行甲板上，于隆隆的引擎声中腾空而起。

夏威夷时间7日早6时15分，从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3架战斗机，在黎明前的夜空中编好队形，组成了第一轮冲击波，发疯般向珍珠港扑去……

当美国总参谋部快速拟好电文，并通过西部联合电信公司将马歇尔的指令拍发完毕时，珍珠港正是清早6时30分。此时，日本战机飞离航空母舰整整一刻钟了。

这时，五艘日本特种潜水艇已捷足先登，到达了珍珠港。

正在珍珠港洋面巡逻的美国“守护人号”驱逐舰与日本潜艇舰队狭路相逢，当美舰舰长奥特布里奇上尉确认墨绿色的海底行驶的正是日本潜艇时，果断下令：“右15度，目标潜艇，深水炸弹攻击开始!”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一艘日本潜艇被炸沉。

接着，另一艘日本潜艇也遭到了“守护人号”的重击……

而此时，驻守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官兵们依然迷醉在“神圣的周末”之中。军官们在陪酒女郎的搀扶下，从“太平洋夜总会”、“夏威夷桥牌中心”等逍遥场所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嘴里不时哼着流行小曲和胡乱叫嚷着谁也听不懂的醉话。檀香山广播电台则依然漫不经心地播放着优美动听的轻音乐，96艘不同型号的美国军舰静静地停泊在清新而平静的水面上，空中见不到一架巡逻的美国飞机，只有教堂传出的圣洁的钟声在宁静淡泊的珍珠港上空慢慢飘荡，悠悠回旋……

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时19分，率领轰炸机群向珍珠港扑去的日本渊田中佐，用颤抖的声音发布了决定美国太平洋舰队命运的命令：“水木兵曹，现在拍发攻击令!”

“虎、虎、虎……”电键快速启动，密码攻击令旋疾发出。

珍珠港美国舰队瞬间笼罩在一片火海爆炸声中。

日机战斗机群投放的炸弹雨点冰雹一样倾泄而下，迷醉在酒精与情爱中的美军官兵在炸弹的呼啸与浓重的烟雾中醒了过来，但除了设法逃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在夏威夷司令部大楼里眼看着他的装甲舰队被摧毁，束手无策。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在被炸沉翻覆时，由于桅杆触到海底的泥沙，最后翻转了150度，倒扣在水底不再动弹，400多名官兵被扣在船壳里被活活闷死。

12 月7 日下午1时50分（珍珠港上午8 时20 分），华盛顿的美海军部接到了珍珠港拍来的第一份电报：“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海军部长诺克斯读罢电文大声叫喊：“不得了啦！这不可能是真的。那一定意味着菲律宾。”

此刻，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白宫二楼圆形书房里，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从东南亚空运的苹果，一边向他的挚友哈里·霍普金夸耀其心爱的集邮册。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是诺克斯，我们侦获了一份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出的作战电报。”

“不可能！”总统说。

“看来已经干起来了。”

“不可能！！”

“日本人正在进攻珍珠港。”

“不可能！！！”

“我将电文念出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致夏威夷所有舰船：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

“迅速通知所有的舰船和军港！”罗斯福盛怒之下脸色胀得腾红。

“进攻还在继续。”诺克斯说：“我几乎听到炸弹的爆炸声了，布洛克说，这回我们挨揍了！”

“快通知美国军队进入作战状态！”罗斯福“咔”地一下挂上了电话，气急败坏地把没有啃完的半个苹果摔在地下，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国务卿赫尔，然后一动不动地端坐在椅子上整整18分钟。

此时，日本的野村和来栖早在日本大使馆门口已预备好汽车，正焦急地等待着《致美国政府备忘录》第14部分的英文译稿。为了避免“偷袭”的恶名，日本政府训令递交该文件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即日机袭击珍珠港前半小时。由于日本大使馆翻译工作迟误，直到下午2时20分才忙碌完毕，野村与来栖乘车急急忙忙地向美国国务院驶去。

此时，正是珍珠港早晨9　时50分，日本第二轮攻击机群正像蝗虫一

样飞抵珍珠港上空。

野村将要递交的文件，赫尔早已通过美国“魔术”密码翻译机知道了详情。他装出一副匆匆看了一遍的样子，然后猛然转过身来，两眼盯住野村，愤怒他说：“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在过去同你进行历时9个月的谈判中，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记录就会一清二楚。我在50年的公职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星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这么多谎言的国家。”

野村欲张口辩解，赫尔挥手加以制止，并用下颚指指门口。

野村的脸“刷”地胀成猪肝色，两眼饱含着泪水，低着头与同伴灰溜溜地走出了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当两人在返回途中，听到了美国广播电台的反复广播：“pearlHarbo—urattacked”（珍珠港遭到攻击），紧张而激愤的播音员已失去平时沉着优雅的语调，不时发出颤抖的声音。

日本轰炸机群对珍珠港先后实施两轮攻击后，于上午9时45分全部撤离，攻击时间共计1小时零50分钟。共击沉美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2艘、油船1艘。重创战列舰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2艘，另有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4艘不同程度地受伤。总计炸沉、炸伤美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40余艘，炸毁、炸伤美飞机450架。有4500余名美军官兵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而日本仅损失飞机29架，潜艇5艘。珍珠港偷袭大获成功!

消息随着无线电波传出，世界一片哗然……

星条旗被迫降落

就在抵达夏威夷的日本舰队轰炸机群从甲板上接连起飞赴向珍珠港的同时，日本驻华远东军陆海军司令部接到了东京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秘密指令：

帝国已决定对英美进入战争状态。驻华陆海军各部，务于8月12时前扫除英美驻华一切敌性武力。封锁敌国所有驻华人员及其财产。

日本驻华陆海军司令部迅速通知所属部队，立即采取行动。

1941年12月，北平时间8日凌晨5时20分，日本驻上海海军井田一郎少佐在四名士兵的护卫下，匆匆来到停泊在上海黄浦江军用码头的美国“赫克尔号”炮舰跟前，向该舰舰长艾里斯特上校递交了一份劝降书。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川岛少佐也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英国驻上海的“赫特勒尔号”炮舰，递交了一份与上述内容大致相同的劝降书。

劝降书实为宣战书，日军的意思很明确，美英两炮舰必须放下武器，拱手投降!

对日军的非礼要求，尚不明底细的美英两舰官兵纷纷对日军的骄横无礼大加谴责。日军方面对美英海军可能产生的反应似乎早有预料，既然劝降不成，那就只有动用武力解决。延至6时10分，日军调集炮舰6艘，飞机12架，向停靠在黄浦江上的英美两炮舰突然发起攻击。

早有准备的英美两舰奋起还击。凄风苦雨，残星冷月下，黄浦江面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美英两舰被日舰团团围住，接连被击中。双方仅交战了20多分钟，301个吨位的英炮舰“赫特勒尔号”就突然被炸起火，只在拂晓的江面上摇摆挣扎了不足3分钟，便在一片惊叫哀嚎声中沉入江底。

美舰“赫克尔号”见状，自知寡不敌众，只得停止还击，在桅杆上挂出了白旗。美英两舰的官兵除死伤者外，共有310多人被俘。随后，日军进驻美英两国在沪租界，并将美英侨民全部逮捕，押入集中营。

就在黄浦江面上战火突起，日美英三方交火之时，驻中国华北日军也纷纷出动，杀气腾腾地向北平、天津和秦皇岛驻地的美军兵营及英美租界扑去。

驻北平日军在小野松支陆军大佐的指挥下，很快包围了驻扎在东交民巷的美军兵营。同时，以东交民巷为中心，对御河桥、英国炮台、美英使馆及其租界各区的街道口等地，实施了全面封锁。

日军的突然行动，引起了美兵营哨兵的注意。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宾逊中校见情况不妙，立即用电话向驻在北平的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Colonel Ashurst)上校作了如下报告：

“哈斯特上校，军营外发现大批荷枪的日军，正在对我兵营实施包围。”

“为什么?!”哈斯特上校从床上坐起，神色紧张地问道。

“不知道，情况尚未查明。”罗宾逊答。

“是不是美日两国干起来了?”

“我也说不清，不过，看样子很像。”

“快，马上调集部队，作好迎战准备。”哈斯特上校下完命令，随后又补充道，“我马上到办公室去。”

在队长罗宾逊的指挥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迅速集合起来，

进入的指定位置。先堵住所有房门，又在门楼上架起机枪，并将营区内的灯火全部熄灭。

未久，日军特使井向关一陆军少佐神气十足地来到了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上校的办公室，匆匆递上一份劝降书：

哈斯特上校阁下：

鉴于日美关系紧张之时局，为维护华北新秩序，避免日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共同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安宁效力，本司令官要求哈斯特上校阁下，即命驻平、津、秦皇岛等地之美军解除武装，归从日本军队安排。美军归从大日本皇军后，其营房、财产及官兵生命安全均受保护，哈斯特上校本人也可继续佩剑，以保持驻华北美军最高指挥官之尊严。

此告务请上校阁下于今日正午12时前执行完毕。在此期限内，日本军队视其情况，考虑直接实施武力。

日本军华北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哈斯特上校匆匆看完劝降书，挥动手臂，往桌上用力一拍，霍地站起，脸色铁青，声音颤抖着对井向关一少佐道："你们打着维护东亚和平的幌子，悍然出兵包围我美军兵营，逼我投降，这已明显地违背了国际法规和日美在东亚缔结的公约协定!现在，我告诉你，无论美日两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爆发战争，那么在美国未战败之前，我们也决不单独求和，更不会拱手投降!请转告冈村宁次司令官，让他立即撤兵!"

哈斯特上校说完，大手一挥："你可以走了。"

井向关一少佐冷笑几声，转身走出办公室，至门口处，又猛地回过头来，轻蔑地说道："哈斯特上校阁下，我奉劝你还是不要感情用事，时间还来得及，好好考虑一下吧。"。

此时，天已渐渐亮了。哈斯特上校刚要去院子看看情况，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又响了起来。

他抓起电话，只听话筒里传来急促的声音："哈斯特上校，我是海军陆战队秦皇岛霍尔塞维斯 (Camp Holcomb) 兵营分队队长戴维斯(Herman Davis)上尉，我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

"说!"

"现在，我们已被日军包围，营区外布满了数不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士，营区上空有6架日机在盘旋示威，港口停泊的日本军舰已经开始转

舵，所有的炮口已对准了我们……”

“先做好作战准备，再听我的命令。”哈斯特上校重重地放下电话，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此前，哈斯特上校曾接到天津美兵营被日军包围的电话，没想到现在秦皇岛防区也被包围了，看来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本来，美国派出的哈里逊总统号(S.S.the President Harrison)轮船原定12月8日，也就是今天的某个时刻抵达秦皇岛码头，美驻华北海军陆战队也定在今天上午全部撤离北平，乘“哈里逊总统号“驶往菲律宾。但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那么日军的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军撤离，还是出于其它什么目的呢?

哈斯特上校当即召集身边的几名军官，商讨对策。两台开着短波电路的收音机，就摆在哈斯特上校桌子的两侧，情报人员在向美国远东亚洲舰队司令部发报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各种消息。

就在哈斯特上校和军官们围绕是决一死战还是马上投降的问题大声争吵不休之时，一条不幸的消息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重要消息：今日凌晨，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机偷袭……

紧张而激愤的播音员声音颤抖，听起来让人感到凄惨又悲凉。

没等哈斯特上校和军官们从这突然而至的噩耗中缓过神儿来，身旁的另一台收音机又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

东京广播电台，现在播发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公告：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凌晨，在西太平洋同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东京广播电台在发布这份《大本营陆海军部公告》时，同美国的态度和气氛完全相反，不仅说话时底气十足，而且还配上了激昂雄壮的日本《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乐曲。

愤怒、懊丧、悲观、绝望……各种复杂的情绪在哈斯特上校和美军军官们的心中急剧翻腾着。办公室里，哈斯特上校等人再度围绕是决一死战还是马上投降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北平市民们度过了一夜的安宁，迎着晨曦，像往日一样走出自家的房门时，发现整个市区的街道已经完全改变了往日的模样——遍地是持枪的日本士兵，四处流动着载有日军的车辆，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各种“布告”、“声明”等等，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胆战心寒。

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大门旁，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张贴一张“避难劝

告”，一群不明真相的市民纷纷围将上去，驻足观看。

劝 告

此次日本帝国与美合众国及英国间，因已发生战争状态，故日本军对其在北京之军队，劝告其自动解除武装。美军如对上述劝告不加应诺时，当行使武力。故居住使馆区域内、明治路以西者，从速撤至该地点以外之地，避免日美交战而造成伤亡。

日本军北支最高指挥官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与此同时，在英美使馆区内外，几个日本士兵也正在张贴着一张内容大致相同的“安民布告”

随着东方大亮，街上的人越聚越多，秩序越来越乱，车马拥在一起，行人挤成一团，东西南北，大街小巷，交通几乎全部堵塞。东交民巷内，日军将六国饭店以东划为临时军事地带，任何车马行人，一律不许通过。对六国饭店的工作人员和旅客，也同样作了不许出入的军事规定。整个东交民巷，笼罩在一片神秘、恐怖的氛围之中。美国兵营一时成为北平市民和各国侨民关注议论的焦点。许多人为亲眼目睹美国军营的状况，冲破层层封锁来到六国饭店四周，爬上楼顶、高墙，向美兵营内窥探。但他们除了看到手握机枪、卡宾枪的士兵正与日军对峙外，并无什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几名被日军特批而进入东交民巷的记者，企图进入美兵营采访，却被美海军守门士兵挡了回来。原因是哈斯特上校拒绝一切来访。尽管如此，北平《晨报》社还是于8日上午印发了一份关于东交民巷现状的《快报》。此《快报》云：

由于东交民巷美国兵营还存留有一百二十名美国海军官兵，所以东交民巷也便成了戒备的中心。每一个道口都伫立着荷枪守望的日本勇士，于是每个道口都堆积了如山的人。日本兵、中国警察在忙乱地指挥，每一个人的面上，现着惊恐和严肃，同时心里也意识着战争的可怕。东西大街的西半截，静静的没有一点响动，只有臂上佩着标志的日本士兵忙着张贴布告，告诉人们日本和美英已经交战了。

美国兵营的大红门，紧紧关闭着，门的旁边贴着一份日军的大布告。在这有着历史价值的一刹那，门口有几个佩带臂章的摄影记者。门楼上的美国国旗，也现出了衰弱无神而在挣扎的气息。记者正在注视着关在门里的一百多名美国兵现在不知作着怎样的窘状的时候，大红门哗啦一声开裂了一条缝，从里面闪出了手提零碎什物的三个厨师傅，同时也看到了手握枪柄的无精打采的美国士兵。美兵营将要崩溃了。

东交民巷的巡捕，已失去了他们昔日所有的威风，低着头坐在道边，身旁还有一个大茶壶。经记者询问，才知道自从昨日上班以后，到现在还没有移动地方，肚子一直饿到现在。

从东交民巷出来，经过东长安街、东单一带，路上的行人是特别多，个个现着有事的神态，同时在每一处壁板下，围聚着仰视日美战争消息的人。诚然，这一个大的波动，不但是中国恐怕是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被它震撼着了。

时间在混乱、紧张、恐怖中飞速流逝，美军兵营内，从哈斯特上校到每一个士兵都坐立不安。面对眼前已无力挽回的败局，大多数官兵已倾向于缴械投降的方案了。

哈斯特上校举棋不定。

本来，他很想听取一下远东亚洲舰队司令部的指令，却始终得不到点滴回音。而此时此刻，那一连串令人沮丧、令人恐惧的消息，又接二连三地灌入他的耳膜：

新德里广播电台综合东京消息：日本大本营发布第二号公告。1．帝国海军于今日凌晨对夏威夷方面的美国舰队和空军断然进行了猛烈的大规模空袭。2．日本海军于8日在上海击沉英炮舰“赫特勒尔号”，美炮舰“赫克尔号”于同时刻投降。3．日本海军于8日轰炸新加坡，收到莫大战果。4．日本海军于8日晨轰炸瓦克岛、关岛之敌军事设施。

东京广播电台新闻消息：1．日军于8日进入战争状态后，立即开始攻击香港，目前正在实施第二轮轰炸。2．日军在陆海军密切协同下，于8日晨奇袭马来岛并登陆作战，目前正在扩大战果中。3．日本政府于8日午前11时颁发对美英宣战布告。

中华社电讯：日本大本营海军扣留敌国船只二百艘以上，其中有美国巨型船“哈里逊总统号”。此船为一千五百个吨位，系美国邮船公司所有，于1921年建造于纽约。工竣后，即行驶旧金山与马尼拉间。此次专为撤离驻华美海军而来中国。但当该船行驶到秦皇岛港外二百海里处，被日海军截获。

……

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消息，仿佛都在向哈斯特上校表明一个意思：没有抵抗的必要了。面对最后的期限，哈斯特上校望着在座的所有军官，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说道：“现在我宣布，华北海军陆战队各分队就地解除武装……”

8日正午12时，美军代表罗宾逊中校正式向日本军方做出答复："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就地无条件解除武装，听从日本军队的安排。"

下午2时45分，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内120余名官兵全体集合，庄严、整齐地排列在国旗下，在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乐曲声中，由哈斯特上校亲手降下了悬挂了14年之久的旗帜。当美国国旗缓缓降落时，哈斯特上校举手敬礼，以示告别。官兵们清楚地看见，哈斯特上校脸在抽搐，手在颤抖，两行泪水慢慢溢出了眼眶……

第二天，也就是美国时间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说：

昨天，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永远是个耻辱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袭击。

在这以前，美国和日本处于和平状态……

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袭击，使美国的陆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大批美国人遇难。

昨天，日本政府出兵马来亚。

昨天，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今晨，日本军队又进攻了中途岛……

我们将永远记住，这样向我们进攻，意味着什么?

不管要打多久才能挫败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美国人民依靠正义的力量，一定能排除万难，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国民政府对德、意、日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

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

"北京人"神秘失踪

日本军队在偷袭珍珠港、包围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同时，对美国

驻华公使馆以及由美国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育英、慕贞等大中小学校，全部进行了封锁。北平协和医学院，自然也在劫难逃。

接管协和医学院的日方负责人，是一个叫松桥的日军上尉。

松桥曾留学德国洪堡大学，获医学博士，他的老师，便是魏敦瑞的学生。此前，松桥曾多次作为日本访问学者，来过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参观过“北京人”。由于是学医出身，又对考古和古人类学有所研究，日本方面特派遣此人前来接管协和医学院，同时扣留保存的“北京人”。

松桥带领的日军不到半个小时，便占领了协和医学院的每个要点，将协和医学院内的美国人全部捕获。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以及一名美国大夫和正在协和医学院养病的美国著名人士、燕京大学掌门人司徒雷登，统统被拘押在胡顿的住宅里。

松桥这位穿着马靴、挂着战刀的日本军官，与别的日本侵略者似乎有所不同，他首先张贴布告一份：凡是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的教职员工，一律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将学院和附属医院的所有资料与标本封存起来，不许乱动。

但未过多久，松桥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起来，关进了北平郊外一间黑屋子。据说其罪状有两条：一是接管协和医学院后对“北京人”追查不力；二是对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太仁慈云云。

与松桥同时进驻协和医学院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即今东京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一到协和医学院，长谷部言人便带领两名手持大枪的日本宪兵，直奔掌握着存放“北京人”地下库保险柜密码的息式白的房间。

魏敦瑞去美国后，作为秘书的息式白一个人留在了协和医学院继续工作。这个寒冷的冬夜，她在黑暗中尚未完全弄清眼前发生了什么，便被日本宪兵从床上“请”了出来，而后挟持着来到了娄公楼地下室藏有保密柜的门前。

“打开!”一个日本宪兵指着门上的铁锁命令道。

“唔、唔……”惊恐莫名的息式白摊摊手，呜里哇啦地说着日本大兵听不懂的鸟语，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息式白小姐，”长谷部言人用娴熟的英语道，“你不要再演戏了，我们非常清楚，这间地下室归你保管，也只有你知道里边那个保密柜的密码。你就赶快动手吧!”

“没有博文的命令，我无权打开这间屋子。”息式白辩解说。

日本宪兵冷笑道："息式白小姐，你别再指望博文了，他和你们的胡顿院长都被拘捕了!"

"什么?!"息式白大惊，望着眼前的日本人，不知如何是好。

长谷部言人态度有些缓和地说："息式白小姐，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日美战争已经爆发了，中国的北平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了!"

"我的上帝啊，这是真的?"息式白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抽泣起来。

长谷部言人伸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语气温和地说："息式白小姐，你不用怕，只要你打开房门和里边的保险柜，就没你的事了。"

"我、我没钥匙。"

"钥匙在哪里?"长谷部言人脸蓦地沉下来，眼露凶光。

息式白见状，打了个哆嗦，嗫嚅道："在我房间里。"

"马上回去取来!"

两个布满杀气的日本宪兵押着息式白，很快将钥匙取了回来。铁门打开，无奈中的息式白在刺刀的寒光中，被迫走到保险柜前，伸手转动了只有她和魏敦瑞才熟知的密码键盘。随着那细长的手指在密码键盘上不停地旋转与拉动，保险柜那足有15英寸厚的钢板在昏暗的灯光下"嘎"地叫了一声，极不情愿地敞开了不知有多少人朝思暮想的神秘之门。

长谷部言人见状，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脸贴在保险柜上，而后瞪圆了双眼，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在柜中仔细查找起来。

他先是摸出一块磨光的鹿角，一盒獾的犬齿、一盒狐狸犬齿，接着又掏出四块石器和七本电影胶片和几个"北京人"石膏模型……

当保险柜中的一切全被查找完毕后，却没有见到真正"北京人"的影子。长谷部言人敲了敲保险箱的箱壁，见无异常，心猛地一沉，蓦然感到了事情的复杂和玄妙。他直起身，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的息式白，两眼放着近似绝望的凶光逼问道："'北京人'化石藏到那里去了?"

"我不知道。"经过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折腾，息式白变得冷静起来。

"你，快说，到底弄到哪儿去了?!"长谷部言人显得异常焦灼不安。

此时的息式白已完全清醒过来。她望着眼前这个气急败坏的日本小鬼儿，斜视了对方一眼，轻轻摇了摇头，背过身去，不再说话，用女人

特有的藐视作了抵抗的武器。

长谷部言人围着保险库转了一圈，看了息式白一眼，突然冷笑了两声，说道：“息式白小姐，你是喜欢来软的，还是喜欢来硬的?”

“我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你那一套！”

长谷部言人听罢，微笑着点点头道：“好，那就请你到喜欢的地方去吧。”言毕，示意两名宪兵将其带走。

息式白满怀恐惧，呜里哇啦地叫唤着，被连拖带拉弄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座有日本兵看守的不知名的别墅里关了起来。日本人对其先是软的，后是硬的，间或软硬俱备，双管齐下。经过一番折腾，息式白在经受了一番痛并不快乐的灵与肉的折磨之后，终于作了如下交待：

“北京人”化石已根据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指示，于12月5日装箱转移。这天上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派了一辆卡车来协和医学院将“北京人”拉走，听说是要搭乘由上海驶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绕道马尼拉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因属重要机密，“北京人”拉走后，是存放在美国公使馆里，还是存放美海军陆舰队兵营，或是已经被运走，本人一无所知。

至此，日本人感到从息式白身上再也无油水可榨，只得将她送回协和医学院，但规定不准走出这座学院，日常行动，由日本宪兵公开和秘密的监视。

就在息式白遭受肉体与精神凌辱之时，被关押在美军集中营的博文也被弄进了一栋不知名的别墅，开始接受秘密审问。

面对博文这种身份的美国人，审讯者开始还装腔作势地好言相劝，最后一不耐烦，原形毕露，令日本宪兵一顿拳脚示以教训。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的博文，在这座不知名的别墅里，对“北京人”的下落做了什么样的交待，一直不被外人所知。只是后来博文重获自由后，与裴文中、胡承志等人断断续续地透露过一点信息。许多年后，根据裴、胡等人的转述，大致描述出博文交代内容的轮廓。博文说：

“北京人”化石由胡承志装完箱后，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很快又将它送到了娄公楼地下室的保险库里。这批东西在地下室里只存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按照上面的指示，押送到了美国驻北平公使馆。12月5日，美海军陆战队又派人从美国公使馆拉走了，据说送到了秦皇岛港。他们要在那里等待原定12月8日抵达秦皇岛港口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至于“北京人”现在到底在哪里，我没有过问，后来的情况如何，一点也不知道了。

博文的这一说法，到底是真是假，仰或半真半假，没有文字证据留下，也没有人给予确切地证明。但一个可靠的事实是，几天后，他又被日本宪兵队送到美军集中营关押起来。

就在息式白与博文分别遭受审讯和折磨时，日本松桥上尉和长谷部言人指示日本士兵，在协和医学院所有可能匿藏“北京人”的地方进行了反复严密的搜寻。但除了找到一些类似“北京人”的石膏模型和其他化石外，仍然未见真正“北京人”的踪影。

到底是谁如此迅速地把“北京人”弄走或藏匿了呢?

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长谷部言人想到了另一个人，此人便是——裴文中。

作为新生代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的裴文中，在后期为什么没有参与极其重要的“北京人”转移工作，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而后来的所有文章——包括裴文中本人在内，对此也没有任何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时候的裴文中并不知道“北京人”已经失踪。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之所以要找裴文中，就是想尽快从裴文中口中打听到“北京人”的下落。当他们突然出现在裴文中的面前时，已完全失去了往日东洋帝国大学“教授”和“人类学家”的风度，张口就问：“裴文中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北京人’化石到哪里去了吗?”

从来者的口气中，裴文中敏感地预感到“北京人”的命运凶多吉少，但又转念一想，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在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前就由胡承志交到美国人手上了，应该是不会有大的险失。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答道：“‘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上，你们应该去问美国人才是。”

“裴先生，实话告诉你吧，美国人还没把‘北京人’运出中国，它就不翼而飞了。我想，‘北京人’现在身在何处，你或许不知道，或许知道一点，那怕是一点，请转告我！” 长谷部言人表情冷冷地说。

裴文中大惊。这是怎么回事呢?胡承志已交到了美国人手上，怎么又不翼而飞了呢?裴文中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头嗡嗡作响，思绪极其混乱，他强忍着悲愤与痛楚，只淡淡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便再也懒得说什么了。

两个日本“学者”相互对视了一下，没有再追问下去，很客气地告辞了。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裴先生，我们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也相信你的记忆力，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后会有期。”

两天后，几个日本宪兵一大早便来到裴文中家中，先是对他进行了

一番审讯，然后厉声吼道：“拿出来!”

裴文中不解：“拿什么?”

“装什么糊涂，居住证!”日本宪兵冷笑道。

裴文中这才明白了一切，原来日本宪兵今天“登门造访”，是授人旨意，没收他的居住证，其目的是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没有了居住证，他不仅不能出城，甚至连上街都是很困难了!他知道来者不善，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好掏出了居住证。

宪兵们得到居住证，匆匆而去。

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日本人找过裴文中，也没有日本人向他提起过“北京人”的事。十几年后，裴文中回忆道：

在此期间，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的日文报纸以及日本的两家大报上，都在第一版用大号字登载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是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他们所知，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是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偷地运往美国了。

这个时候的裴文中，还一直认为“北京人”已被运到了美国本土，或者被美国人藏在了什么秘密地方，只要战争结束，这一珍贵的人类至宝还会轻易回到它的故乡的。

但事实却远远地出乎他的意料。

第七章 紧急搜寻

“野山之狐”悄然来华

从1941年到1942年，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始终没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尽管他和他的同伙们绞尽脑汁，利用了种种手段，但“北京人”始终音信绝无。到了1942年下半年，原本踌躇满志的长谷部言人才感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在极度的沮丧和懊恼中，他从北平返回东京，上书日本文部省，将在北平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提交了书面报告，其中写道：

文部省：

存放于协和医学院密室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已被转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学价值不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标本。经初步调查，是美国人转移了“北京人”，因为他们已预料到日本皇军将占领北京协和医学院。如果我们的调查和估计无误，“北京人”应该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藏匿着。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搜查之中，只要有一线希望，决不放弃最后努力。同时，我们请求文部省与军令部协商，令华北驻屯军派出精干的情报人员负责继续搜查。

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顿觉事关重大，立即找到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经过协商，陆军司令部很快发出命令：

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

至此，长谷部言人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专门从事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伟事业”，则将由日本“北支总部”的一名著名侦探来接替完成。

于是，一个具有“野山之狐”之称，名叫乔治·锭者的人悄然出现在北平街头。

锭者潜入北平后，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裴文中。当他来到裴文中家时，裴外出未归。当裴文中回家后，家里人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锭者，还留下了一张名片。让你明天不要出门，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你谈。”裴文中拿起那张烫金的名片，斜了一眼，便随手扔在一旁。

第二天一早，锭者再次来到了裴文中家。他一见裴文中，显得十分的客气和热情。几句寒暄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北支总部’派来的侦探，奉军部最高命令，为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而来。我已经知道

藏在协和医学院保险柜中的‘北京人’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时我还知道盗窃者就是美国人。现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诉我‘北京人’丢失的一些具体情况。”锭者的言谈举止，不像长谷部言人那般吱吱唔唔，拖泥带水的样子，显得干脆利索，简单明了。

“我的办公室在西城兵马司9号，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者离得远，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裴文中答。

“负责装有‘北京人’保险柜的人是谁?”锭者问。

“是美国人博文他们负总责，谁负具体责任，我也不太清楚。”裴文中答。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锭者问。

“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地下保险库。”裴文中答。

“你最后看见‘北京人’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日美开战的前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头骨来研究，进过保存‘北京人’的地下保险库。”裴文中答。

锭者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热衷于做学问的人，不是政客。只要你肯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为尽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从现在起你不能出门，至少两个礼拜内不能出门，要随时等我找你谈话！”言罢，转身告辞。

锭者确是个精干、狡诈的老手，从裴文中家出来之后，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协和医学院内所有与“北京人”有关和可能有关的人，全部审讯了一遍，那位曾用小平车根据博文的指示，把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送进保险库的勤杂人员常文学也没漏掉。不过此时为“北京人”装箱的胡承志已经跑掉，锭者暂时没有时间找来审讯。

一圈审讯下来，锭者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最后，他把“希望”押在了博文身上。

此时被关在集中营的博文，在长达一年多的折磨、拘禁中，浑身是伤，满面憔悴，形同欲死之人。当锭者找到他后，又是一轮不分白天夜晚的折磨与审讯，但无论如何折腾，博文的说法与一年前大同小异，没有交待出具体的线索。几个回合下来，终于导致博文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见此情形，锭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样将博文重新扔进了集中营不再顾及。

狡猾的锭者在综合、分析了所有调查情况后，将追查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自1941年12月8日那场灾难从天而降之后，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的境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最新型的、最强大的战舰“勇猛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相继被日军炸沉，有名无实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眼巴巴地看着这支同盟舰队在海浪中打滚翻腾却无力参战。而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泰国也先后受到日本军队的攻击，新加坡沦陷了、香港沦陷了……日本陆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整个东南亚山崩地裂，英美军队到处都在溃退、溃退、溃退。

太平洋海岸的战争消息，使这支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军不寒而栗，而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恐惧。这些驻平、津、秦皇岛的美国海军，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在敌人占领的国度里作为俘虏的滋味。只要日本士兵走到面前，就要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外加一顿拳打脚踢、棍棒加皮带的惩罚。

锭者首先找到了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上校。这时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傲慢与神气，尽管依然身着军服并佩有日本人特许的长剑，然而那长长的佩剑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挂腰间，让人顿生可怜和滑稽之感。事到如今，“高等”的白人不得不向日本小鬼低下了那“高贵”的头颅。

锭者审问的结果，仍令他大失所望。哈斯特上校坦言：他确实曾经接到过美国公使馆的指示，让他负责转移“北京人”，但他并没有具体承办这项任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更紧迫的军务要做。至于“北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是三块骨头还是五根肋骨?是装在白色木箱里还是装在红色皮箱里?是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他从未见过，因而一概不知。至于派去载箱的士兵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装有货?拉到了那里?他也同样无可奉告。

锭者只好暂时放弃了哈斯特上校，转而找到了曾经去协和医学院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军上士斯耐德尔和中士杰克逊。按锭者的设想，这两个直接承办“北京人”化石的转运者，应该知道“北京人”的去向。

然而，当锭者在集中营找到二人时，情形却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

斯耐德尔和杰克逊站在锭者的面前，紧绷着脸，不愿正面与其对视。在锭者的再三逼问下，二人承认去过协和医学院押车装过一批货物，但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将这批货物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之后又奉命押往秦皇岛，然后放入了瑞士仓库。至于这批货物里面到底有没有红木箱或白木箱，木箱里有没有“北京人”，毫不知晓。按两位士兵的解释，上级交代任务时并没有让自己知道箱子的颜色和形状，更没有告诉自己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作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

军人，也自然没有资格去打听，否则就属违犯军规。

尽管锭者对两个美国士兵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只得匆匆收场。

这位著名的侦探回到住所，把近一段时间调查的线索仔细地疏理了一遍，得出了如下结论：既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受美国公使馆的指令而去协和医学院转移过一批“货物”，那么“北京人”肯定就在其中，只要搞清这批货物的所在地点，“北京人”定在其中。根据两个美国兵的说法，“货物”已被转押到了秦皇岛瑞士仓库，那么“北京人”就应该还藏匿在秦皇岛瑞士仓库的某个地方。于是，锭者最后认定，可能存留“北京人”的地方只有两处：一、秦皇岛瑞士仓库(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二、美国海军驻北平陆战队兵营。

根据这一设想，锭者当即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作了报告，得到准许后，马上带领一群士兵，首先冲向美国陆战队驻北平兵营进行搜寻，但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仍未发现“北京人”的踪迹。这意味着“北京人”惟一可能存在的地点，就是秦皇岛瑞士仓库。

锭者马不停蹄地向秦皇岛赶去。

剖腹自杀的日本侦探

昔日井然有序的秦皇岛，此刻已变得混乱不堪。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缴获了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的枪支后，紧接着便对美国在秦皇岛及市区的所有物资全部进行了严密封锁。

这时的秦皇岛码头，从北平、天津等地运来的集装箱已塞满了整个货栈，偌大的瑞士仓库早已满得几乎放不下一个铁钉。整个码头耸立起了一座座由货物堆积而成的小山包——有的用白色篷布遮盖着，有的顶端搭上几块草席，有的干脆什么也没有，任凭风雪肆虐。这些货物大多是在等待即将到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与其他美国轮船公司的船只装载，想不到包括“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在内的二百多艘大小船只，未能靠岸就被日军截获，美国驻华军人与公职人员多数已被捕关押，码头上的货物便成了一堆堆既无人运走也无人领回的“流浪儿”。

由于战局不断恶化，秦皇岛港成了日军转运战备物资的专用码头。随着一批批战争所亟需军火的运进运出，原存放于码头和瑞士仓库的美国人的物资，有的被日军抛入大海，有的被运到大街上卖掉，有的被洗劫后变成了他人的私有财产。整个港口成了各色人等趁火打劫，发财致富的角逐场。

锭者一到秦皇岛，立即将“北京人”的调查情况向当地日军司令官作了汇报，并要求派兵协助搜寻。

一时间，整个秦皇岛港内港外，无论是大小板箱还是集装箱，统统以各种方式被打开进行仔细搜查。整个码头、仓库和货栈，铺满了被从箱子中扔出的衣服、书籍、铁器、瓷器、木器等各色物品。日本士兵的皮靴在上边来回走动，几乎将这些抛散的物品碾成了一滩滩湿泥和碎片。

然而，锭者和他的士兵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搜查，连一块骨头的碎片也没见到。

当一个红着眼睛的日军中尉于夜幕低沉中说出最后搜查结果时，锭者的心“咚”地一沉，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一块石板，脱口说道“难道又落空了？”片刻之后，又呈歇斯底里状地狂吼道：“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搜查彻底!，找，给我继续找!哪怕挖地三尺，也一定要给我找到!”

“前几天有一批美军的行李从这里运到了天津，要找的东西会不会被藏在了里面呢?”负责搜寻工作的陆军中尉想了想，小声嘀咕了一句。

“什么?还有一批运走的行李?!”锭者喜出望外，阴郁的脸上立刻绽出激动与兴奋的蓝光，如同一个溺水者突然抓住了一根漂荡的枯木。

“是的，是根据派遣军司令部的指令运走的。”

“为什么要运走这批东西?”

“这不是我应该知道的。”

“运走的货物现在放在了什么地方?”锭者神态紧张，仿佛刚刚抓住的枯木又漂荡而去。

“大概还存放在天津瑞士总库吧。”

“真的?!”锭者几乎跳了起来。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转身望着海面上星星点点的灯光，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北京人’，你搞得我好苦!”

锭者率部回归后，第二天并没直接转道去天津，而是悄悄地返回了北平。经过一夜的思考，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与此事关系重大的女人——息式白。

此前，锭者为寻找“北京人”下落，曾先后三次找过这个协和医学院的女秘书兼地下保险库保密柜的保管人。这个外表算不得漂亮却性感十

足的女人，给他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的印象。或许，这个女人能给他带来好运。

锭者来到协和医学院，找到了息式白，令他与自己到天津走一趟，以鉴定可以发现的“白京人”的真伪。在日本占领下的协和医学院，息式白早已成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式的人物，不敢造次，只好随锭者赶往天津。

随后的三天，约30名日本士兵在锭者的指挥下，对天津瑞士装卸公司总库的所有行李箱、集装箱，甚至一个书包，都进行了无一遗漏的搜查，仍没有见到“北京人”的半个影子。锭者孤注一掷，又下令将仓库的每一个角落反反复复地搜查了一遍，还是没有结果。

锭者绝望了。无奈中，只好携息式白返回北平。

当二人并肩走出北平车站时，息式白一眼看到广场上挤满了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而四周则是荷枪的日军正押送着美军向站内拥去。息式白没敢在此久留，尽管她很想弄清这群美国兵的去向，但出于安全考虑，她与锭者匆匆分手后，便找了一辆人力车，回到了协和医学院的住处。

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了一则消息：《驻京美海军陆战队转往上海江湾战俘营，昨日已从北京前门车站登车起程》。在这条醒目的标题下，还配有大幅照片，显示出在日军的胁迫下，美海军陆战队登车的情景。

就在息式白在自己的居处阅读《晨报》之时，在西城一座华丽的别墅里，号称日本帝国著名侦探的锭者，正在一步步朝着死神走去。

锭者在北平车站与息式白分手回到住处后，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把焦躁不安的情绪强压在心底，开始撰写一份关于寻找“北京人”经过的《备忘录》。

这个计划在他从天津返回北平的列车上就已想好。从东京来北平之前，他没有想到“北京人”的搜寻会如此艰难——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也并不认为这件事就算得上有多么的艰难，只是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使此事变得复杂起来，最后导致无果而终。而在他的心目中，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令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失败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军的圣洁，有辱自己作为日本帝国一流侦探的声名，惟有一死，方能清洗掉自己的罪过”。

于是，他将在一夜之间写成的《备忘录》密封好，交给一名侍从，命他务必亲自转交给北支派遣军司令部。

随后，他脱下自己身上那套精工做成的毛料军装，换上一件黑色礼服，跪在一个低矮的漆桌旁，面对墙上洁白明亮的镜子，在胸前慢慢画了一个十字，嘴里说了几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语，抓过一把日本武士军刀，慢慢对准了自己的腹部猛地刺了进去……

正当锭者躺倒在血泊中等待生命结束时，他的侍从因半路返回取一件东西与其相遇，昏迷中的锭者被送进了医院。

锭者的性命总算保住了，但他的侦探生涯也就此结束。

不久，锭者被送回了日本，一个月后又被关押了起来，直到二战结束，才恢复了自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盟军缴获的日军情报资料中，发现了锭者自杀前书写的那份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从而引起圈内人士的极大兴趣。至于锭者在这份鲜为人知的密文中到底对“北京人”的下落记下了什么秘密，埋下了什么谜底，由于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盟军司令部从中作梗，当时由中国政府派往东京以朱世明将军为首的接收团，没能得到这份文件或文件的副本，内中详情只有美国占领者中的少数几个人知晓了。

当然，对锭者此次天津之行，当时驻日本的盟军总部也传出了一点内部消息，说是锭者在天津瑞士总库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并秘密转移到日本。而他的自杀，则是迫于日本高层怕其日后泄露天机，遂命他自杀。想不到这个被打发到阴曹地府报到的倒霉蛋，又阴差阳错活了过来。恼怒的日本高层便把他召回国内关押起来，直至不久死在狱中。

因了这不同的说法，关于“北京人”最后的下落，再度引起了世界性关注。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正当世界各地，尤其是北平和天津两地纷纷议论“北京人”，并把它的失踪和日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英文版的《北平时事日报》突然又爆出了一条新闻：

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骨被窃

有名的“北京人”被模型所调换

一个美国职员被怀疑为主要盗窃者

中华同盟社消息：约在五十万年前居住在北平附近的人类祖先——著名的中国猿人的头骨发现被窃，在它原来的地方被运出而替换了一个模型。

这个惊奇的事情是被两名日本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长谷部言人和该系的助教高井冬二先生所发现。他们在1942年8月19日到达北京，在周口店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

当这两名学者去参观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极为珍贵的原始人类化石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北京人”头骨已被模型所调换。该学校里的一位美国职员被怀疑曾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取走了真正的头骨，因为他预料到日本将武力占领学校。

偷盗发生在两年以前吗?

长谷部言人博士指出，若干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属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人类骨骼的真实标本却都留下了。从另一方面获悉，有一个日本医学院的毕业生松桥在某次为研究人类学问题去参观北京协和医学院时，曾经亲眼看见中国猿人的头骨标本。他说，他在1940年时，同许多日本学者去该校的时候，他们发现，在该学校的储藏室里，只有一个爪哇直立猿人的模型。据松桥说，有这样一个合同，就是禁止“北京人”头盖骨从这个学校运出。

这则消息所说内容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是，消息公布后不久，长谷部言人便很快从周口店撤出，不再进行发掘。据裴文中后来回忆，此后日本人也放弃了对他的纠缠，再也没人找过他的麻烦。当时裴文中还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日本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然后让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认。可息式白到了天津刚下火车，日本人又对她说：“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马上回去吧，没你的事了!”从此以后，日本人便再也没有找过“北京人”了。不久之后又传出一个说法：在锭者自杀未遂之后，日本军部又派出一个陆军大尉继续寻找“北京人”。但这个大尉是谁?他搜查的经过和最后的结果如何，外界一概不知。

事实上，有关“北京人”的丢失、寻找、议论、猜测，在纷纷扬扬了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因为此时人们关心和更有兴趣谈论的，是风起云涌的有关战争的各种消息与传闻。比如，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战场以及诺曼底登陆等等。

就日本帝国而言，自偷袭珍珠港大功告成之后，尽管逞凶一时，但很快又陷进了一个难以自拔的烂泥坑。按当初日本人的设想，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在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所料。日本兵力原已不足应付侵华战争，在匆匆开战的太平洋战争中，仅外围战线就长达万余公里，

本土与前线相距甚远，仅东京到所罗门群岛就超过五千公里。要在如此长远的战线上作战，其兵力、运输能力都极为不足，最终只能导致全线崩溃。同时，日美两国综合实力悬殊，美国仅1943年制造并编人现役的航空母舰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战败时，全部用于战争的航空母舰才不过25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下令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太平洋上的势力迅速恢复，并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美军很快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11月，美军出动B-29远程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扑东京，实施连续大规模轰炸。另一路美军从西太平洋沿新几内亚北部进攻，与英、澳、荷军队会师后，攻占新几内亚西部。

1945年2月，两路美军胜利会师，重返菲律宾。6月，美军迫近日本国门，日军“大和”号巨舰沉没，海军舰队全部被摧毁。

在缅甸战场上，从1943年l0月开始，中、美和英、印、东非、西非部队先后在缅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于1945年3月底发动总起义，5月1日解放仰光。日军在缅甸彻底失败。

在中国战场上，由于中国军民坚持不懈的反击，终于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企图以战养战、把中国占领区变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有力地配合、支援了盟军的对日反攻。

1945年7月，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早日投降。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

8月6日，恼怒中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迅速出兵中国东北，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被歼灭。

8月9日，怒火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化为一片废墟。

当晚，由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至此，中国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打败了日本人。

至此，在战争中失踪的“北京人”，像《桃花源记》中所说的神奇故事一样，再度让他的后世子孙发现了“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一线希望。便“舍船从口入”，若“复行数十步”，真的可以“豁然开朗”吗？

就在抗日战争胜利三个月之后的1945年11月19日，美联社自东京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

在被日本军队送往日本又被占领当局取得的掠夺品中，发现有来自已知人类最早祖先之一的山洞中科学上的无价之宝“北京人”。

现在得知在取得的这些掠夺物中，包括有粗糙的工具，雕刻的牙齿的装饰品和说明这些物品在1929年北平附近周口店石灰岩山洞中发现的位置略图。它们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保存过。

从被没收的信中泄露，“北京人”的遗骸曾被中国人很好地保藏起来，躲避了日本科学家三年的追寻。在日本当局通知了盟军总部后，这些物品在东京帝国大学内找到。

盟军总部的科学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职员怀特莫尔博士现在保管这个遗骸，并准备送回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

这则新闻如同“北京人”的发现和失踪一样，再度令世人为之震动，多年来渺无音讯的人类至宝终于在日本那已被盟军战领的国土上露出峥嵘，这对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中国人尤其是与其相关的科学家们，无疑是莫大的慰藉。

一个多月后，即1946年1月2日，英文版的《北平时事日报》又发表了英国路透社1月1日发自上海的一则消息：

“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

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作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

寻找了三年之后，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由一个专家负责监督把它运往东京。遗骸和图标以及其它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

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科学家曾在发现过“北京人”遗骸的周口店附近进行过新的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新的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它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

如果说1945年11月19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多少还让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让人如同吃了一粒定心丸。——“北京人”真的要失而复得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数众多的中国科学界人士积极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组织人力，飞赴东京，从侵略者手中索回这一人类至宝。

机会终于到来了。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

李济在日本的搜寻

1946年3月31日，中国航空委员会派出的飞机第一次飞入日本领空。

日本投降后，同盟国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因而，这架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便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朱世明将军，顾问便是具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称谓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家李济博士。

李济此次以顾问的头衔随团赴日，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讲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将军。其人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据李济后来撰文说，最初他听说自己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但当自己将有关“北京人”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对方交谈后，这位司令官很快理解了中国人的心思和做法，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着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未久，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已经清楚地说明，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怎么转眼‘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惊讶的同时又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将军的话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对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的。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人类进程史的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斯脱特十分爽快地满口答应着。

李济与斯脱特道别后，即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按他所掌握的线索与判断，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盟军总部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 1942年底，二人由中国返回东京后，开始研究从中国运来的化石标本。日本战败后，二人陷入了战败后巨大的精神痛苦与绝望之中，前一段时日离开东京，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面对盟军总部的答复，李济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因有其他事务在身，遂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随后，李济又和盟军总部负责文化物质接收事宜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由于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较有了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

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代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他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同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山顶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盟军总部已经采取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

少校谈完意见后，提议与李济一起去京都走一趟，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自是喜出望外，这正是自己此次日本之行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人赶往京都，并住进了同一所饭店，李济利用各种机会与史克门少校交换搜寻“北京人”的线索和见意。遗憾的是，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下落的确切线索。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仍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盟军总部的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美联社与英国路透社相继发表了“北京人”找到并即将归还中国的消息，而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主其事者，对“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中，或者他们藏匿在了什么隐密之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谁又能够断言，美国人就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中将“北京人”抠出来，装入自己的腰包呢?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作了汇报，朱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及其它人类学标本的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

备忘录

致：威娄柏中将

参谋长助理

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

1．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1)“北京人”标本，包括七个头骨、十二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2)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3)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4)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5)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2．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2)和(3)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C．I．E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3．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国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4．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 朱世明

1946年4月30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1．“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2．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3．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交还代表团；

4．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尽管李济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见到“北京人”的踪影。

5月5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离开日本回国。

在此之前，裴文中曾致电在重庆的翁文灏，希望能随中国代表团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但翁文灏不久回电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李济随团赴日，你就不必去了。面对此情，裴文中只好给李济写信，嘱他

到东京后一定要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索回“北京人”头骨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后，裴文中迫不及待地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5月24日，李济给裴文中回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信中写道：

文中先生：

5月21日手示敬悉。弟于5月5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实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

撰安

弟 济手启 卅五．五．廿四

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裴详细问及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情况时，李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后来又说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

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学术界有相当的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

美国人的神秘信件

中国代表团回国不久，被日本人掠走的周口店化石标本以及其它资料等很快由盟军总部接收并交还了中国，但当年日本从中国掠走的大量人类化石标本，还回中国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在“北京人”转移时，胡承志亲自装箱的清单是——

一只较大的白木箱子里，共装有七盒标本：

第一大盒：“北京人”的牙齿(分装七十四小盒)

“北京人”的牙齿(分装五小盒)

“北京人”的残破股骨九件

“北京人”的残破上臂骨两件

“北京人”的上颌骨两件

“北京人”的上颌骨一件(发现于山顶洞底部)

“北京人”的锁骨一件
“北京人”的腕骨一件
“北京人”的鼻骨一件
“北京人”的腭骨一件
“北京人”的第一节脊椎骨
“北京人”的头骨碎片十五件
“北京人”头骨碎片一盒
足趾骨两盒
猩猩牙齿化石三小盒
“北京人”的残下颌骨十三件
第二盒：“北京人”头盖骨
第三盒：“北京人”头盖骨
第四盒：“北京人”头盖骨
第五盒：“北京人”头盖骨(1929年从“E地”发现)
第六盒：“山顶洞人”女性头骨
第七盒：“山顶洞人”女性头骨
另一只较小的白木箱子装有下列标本：
“北京人”头骨(从“D地”发现的)
“山顶洞人”头骨(男性老人)
猕猴头骨化石两件
猕猴下颌骨化石五件
猕猴残上颌骨化石三件
猕猴头骨化石残片一小盒
“山顶洞人”下颌骨四件
“山顶洞人”脊椎骨一大盒
“山顶洞人”盆骨七件
“山顶洞人”肩胛骨三件

“山顶洞人”膝盖骨三件

“山顶洞人”头骨残块三件

“山顶洞人”跗骨六件

“山顶洞人”骶骨两件

“山顶洞人”牙齿一玻璃管

“山顶洞人”下颌骨残块三件

而战后日本人归还中国的关于周口店的物品清单则是——

周口店第1地点不同水平层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一套

野外工作办公处的简报和帐目十一套

给外国的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清单一套

周口店外景的电影片七本

山顶洞磨光的鹿角一件

山顶洞狐和獾的犬齿一盒(四十四个)

未磨过的山顶洞狐狸和獾的犬齿一盒(三十七个)

山顶洞的石坠、骨针、带红色的石灰岩碑块和大型鹿的犬齿一盒

山顶洞狐狸的犬齿(典型标本)一盒

山顶洞的人工穿孔的蛤蜊壳、鸟骨坠、鱼骨、鱼的脊椎骨和石珠一盒

山顶洞的石器四块

第1地点的石器三块

第1地点烧过的鹿角碎片一盒

第15地点石器五块

第15地点石器一块

文件(英文)三卷

两相比较，差别甚大。而且，在日方归还的这一极少部分物品中，根本没有一件是“北京人”的化石标本。

于是，中国科学界不禁发出疑问，日本与美国，究竟谁是“北京人”的真正盗贼?如果“北京人”不在日本，又在哪里?日本退还的这些东西

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通过何种方式与渠道从中国掠去的呢？

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十分关注中国此次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从日本回国后，魏敦瑞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

1946年7月12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沃特莫尔（Frank　C.Whitmore）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您的亲爱的沃特莫尔

1946年7月12日

沃特莫尔曾在1945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美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受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以便让他顺利找到“北京人”遗骨。

裴文中当即回信，告诉对方，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在北京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可靠的消息。

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沃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仍石沉大海，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沃特莫尔的这封来信。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沃特莫尔却在信中含含糊糊地说“但是不能这样做”。此话到底何意？为何不直接言说在东京的寻找遇到了那些麻烦，而要说“不能这样做”呢? 难道是沃特莫尔有其他的苦衷和难言之隐?

沃特莫尔当时的身份是美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这样的身份和条件，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为何开始雄心勃勃，后来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中途转轨“不能这样做”的?

另外，沃特莫尔在信中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到二人?若相见，对方如何回答?假如没有相见，又是为什么?难道也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是不可能越过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既然找到了二人，“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有一个说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就一定知道“北京人”的下落，或者就是他们劫去并藏匿了“北京人”，但至少应该把他们在华寻找经过和所见所闻说个明白，弄个清楚。可为什么沃特莫尔对这至关重要的线索避而不谈，只简单而含蓄地说“不能这样做”?这句充满玄机的话，到度暗含着什么隐秘?

据裴文中后来得到的消息，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氏基金会飞抵东京进行了秘密接收，事后却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部分化石标本与发掘的电影胶片。美国派去接收的人是谁？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外界不得而知。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人之外，更是无人知晓。

裴文中反复看了沃特莫尔的信，一个个问号在脑中显现，但一时又找不到答案。最后决定根据沃特莫尔的建议，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

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娄柏陆军中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备忘录之后，便将备忘录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将由他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其它化石标本的下落。与此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的下落。当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后，希望对方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

但是，善克中校与他所率领的调查组在日本转了一圈，然后又奔赴关岛医院，与已转移到那里疗养、等待回国的原驻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哈斯特上校及下属官兵进行了交谈，仍一无所获。

善克回到美国后，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详细地叙述了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一团糟!而善克中校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北京人”的最后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

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片碎骨。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1947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立即呈送国民政府，并请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进行调查。

但这个时候国共内战已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眼看首府南京不保，他这个“南京人”都面临着溃逃的境地，哪里还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搜寻计划的实施，但最终还是在越来越酷烈的内战炮火中化为泡影。

举世瞩目的“北京人”国际大搜寻，暂时告一段落。

指控与反指控

当国共内战炮声渐稀，蒋介石率国民党残兵败将退居台湾孤岛，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控制大陆并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后，“北京人”的下落再度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与寻找的念想。

1950年3月21日，香港《大公报》登载的一篇专访裴文中的报道：

“北京人”被劫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1929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自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1943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五十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京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

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

……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南按：指美国的沃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秘而不宣，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之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言人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

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地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帝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篇专访尽管具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词造句也显粗糙，但却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布——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是“北京人”失踪近十年来，一直沉默的中国学术界首次公开提出“北京人”的下落，并指责美国这一“贼喊捉贼”的丑恶行径。消息传出，无异于在阴霾的天空炸响了一声惊雷。它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强烈震惊的同时，也让美国人大为惊讶。尤其是美国科学界，更感到震惊与不可思议。未等世人回过神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直接将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和魏敦瑞推到了审判席——

帝国主义野心毕露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是1929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1941年12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京，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然而，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北京人”在失踪近十年后，终于被正义的人民群众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的国宝，被美国长期霸占迭十年之久，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让“北京人”化石物归原主。

报道所说的“共产党员”是指一个叫华特生的英国古生物学家，此人曾致信中国科学院高层，谓在纽约亲眼看到了“北京人”。潜逃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暗指魏敦瑞，而提到主持化石展出者，则是另一位古人类学家哈里·夏皮罗（Harry L.Shapiro）。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古人类学会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头盖骨及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化石。随着日美关系紧张，夏皮罗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共同坚持研究从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于1948年7月去世，据说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北京人”，并嘱托夏皮罗继续关注这一人类宝藏的下落。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还是私人感情上，继魏敦瑞之后与“北京人”有“亲缘”关系的夏皮罗，对寻找这一珍宝自然有着莫大的热情。更何况，能够寻找到“北京人”，也是一种莫的荣耀。

于是，当红色中国宣告成立时，夏皮罗即动手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有关“北京人”下落的各种资料，准备亲赴中国和日本等地加以搜寻。

然而，正当他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同意他这一计划时，韩战爆发，朝鲜半岛与鸭绿江畔的隆隆炮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的脚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夏皮罗看到了这篇不点名的指责报道，于极度的震惊中叫苦不迭。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和全美古人类学会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为其“辟谣”，为他所服务的博物馆正名。

于是，195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夏皮罗的反驳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什么所谓的“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中共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纷纷站出来为美国和罗皮罗本人辩解。

一时间，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从1950年到1959年，中美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尽管论战对探寻“北京人”的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却形成了不小的伤害。而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依然没有人能够做出附合逻辑，又令众人信服的定论。

正因为这场“中美大战”，又勾起了许多原驻华美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回忆，一位叫威廉·弗利的美国医生，声称他曾在华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受上司的指令，专门负责“北京人”化石的转移事宜，但化石尚未运出中国国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其他队员一起被俘。他被押送到日本战俘营前，避开日本人的监视，巧妙地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几个军用提箱分别寄存于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国人设在天津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家中。弗利相信“北京人”仍在天津，并设法取得赴中国的机会进行寻找。

遗憾的是，此时的中美关系仍处于极端对抗的冰冻阶段，稍后中

国“文革”爆发，弗利的心愿迟迟未能实现。

但正是这个意外插曲，又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增添了颇为玄妙的一笔。

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历史的脚步于匆忙中跨进了20世纪70年代的门坎，随着中美关系日渐缓和，威廉·弗利欲赴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计划出现了一丝曙光，他开始为此奔波起来。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奔波忙碌，竟引起了大洋彼岸一个的关注，这个人就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1971年初的一个傍晚，解学恭刚吃过晚饭，便悠闲地拿起了一份由新华总社下发的当时只有高官要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内部参考》浏览起来。刚看了一会儿，一则转载于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眼珠。消息说：

二战前驻中国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博士，已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准备亲赴中国的北京、天津等地，寻找二战期间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弗利向记者回忆了当年他在平、津两地的那段生活后，又特别提到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弗利本人向记者表示，无论此次去中国的计划是否实现，不管失踪已久的人类文化巨宝“北京人”化石是否还能找到，他都将自己参与寻找“北京人”的有关事实和线索，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公布于天下云云。

解学恭看完报道，不觉为之心动：弗利提到的当年隐藏“北京人”的三个地点，全在他管辖的天津市区内。富有敏锐政治头脑的解氏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个极富有刺激性的事体，若让公安局出面查一查，比整天没完没了地整治几个当权派和批斗几个臭知识分子刺激多了。尽管已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当权派与臭老九们，整天哭爹喊娘，呈杀猪状地嗥嗥乱叫，但毕竟见得太多了，各路神经都已被麻木。相比较而言，若把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从天津某个角落里揪出来，或展览，或示众，或游街，那该是一件令人感到很爽的事情。于是，解学恭摸起一支大笔，三下五除二地在这份《内部参考》上作了如下批示：

市公安局：

美国人提供的当年“北京人”失踪的三条主要线索，都发生在我们天津，请你们组织人员查一查是否属实。若确有其事，尽快组成专案小组，立案查处。此事关系甚大，注意保密。

天津市公安局当权者接到解学恭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组成了专案小组，精选了办案能力极强的王重光任组长。

王重光受领任务后，很快给中国科学院发去一封公函，对查找“北京人”一事作了说明，希望中国科学院派人在北京协助查寻有关线索。

接函后的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当即指示由下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两名精干人员，协助查寻有关线索（当年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新中国成立后归该所拥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委派刚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回所不久的张森水和吴茂霖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协办此事。

张森水和吴茂霖均是裴文中的学生和助手，对“北京人”的感情自然要比一般人更为深重，哪怕仅有点滴线索，也愿意积极参与寻找，加之“文革”的烈焰依然升腾不息，打砸抢烧与“破四旧”的风头正劲。能在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但暂时还没有达到伟人所说“大治”的情形中，协助寻找“北京人”，自是一件难得的幸事，也是一件颇感刺激的大事。

张、吴二人很快和天津公安局专案组取得了联系。根据对方的要求，二人需要首先查实弗利此人到底有没有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如果查后确有其人，天津方面再按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一路查找下去。若是其人根本就没在协和医学院工作过，那无疑是帝国主义故意施放的烟幕弹，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他们盗窃“北京人”的罪恶行径。

张森水、吴茂霖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很快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找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的林巧稚、张孝骞、钟慧澜等著名医学专家，并一一进行了询问。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专家称：弗利何许人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面对此情，张森水、吴茂霖认为是天津方面搞错了，便乘车连底赴津，找到市公安局专案组人员，将在北京查询的情况作了说明，并提出能不能看一看天津方面所掌握的有关档案材料，以验证是否搞错了人名。专案组组长王重光有些为难地说：“这是首长交办的绝密案件，非专案组正式人员，是不能查看的。”张、吴二人听罢，不好再说什么，只表示愿意继续协助专案组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此后，专案组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天津方面有关线索的侦查；另一个小组则到北京，对弗利是否曾在协和医学院一事作进一步核实。同时，对当年由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北平总行是否染指了“北京人”一事，也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询。

天津专案组人员来到北京后，住进了公安人员常住的崇文门宾馆。

他们经过一周的艰苦查访，终于查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确实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只因他工作的时间较短，加之他当年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上尉军医，故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张孝骞等人的注意。同时，经过查证，弗利其人确实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兵营的军医，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俘虏，也属事实。

但天津专案组人员在对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的调查，属于异地办案性质，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又是涉外机构，他们无法看到档案，使查证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鉴于此情，天津专案组人员只好又找到张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协调，请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总行属于北京管辖范围，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案，就会顺利得多。

张森水认为这个意见自有道理，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给了中国科学院。遗憾的是，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大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来落实此事。而那些革委会的头头们，关心的只是“造反有理”与“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更不会过问与大局无关的“闲事”。张森水写的报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北京方面的查找，至此中断。

天津方面的调查，进展还算顺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条线索中，其中一条是他将一个军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经专案组调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确实做过一些倒卖文物的生意，染指“北京人”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专案人员在调查中，与之相关的人员却一口否认他们曾经收到过弗利送去的军用提箱，更没有见到过什么“北京人”化石，甚至有人还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弗利这个所谓的美国医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条线索，是说他将一只军用提箱放在法国人开办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经专案组对原巴斯德研究所部分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正当一筹莫展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有人提供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线索，说这个中国女人当年曾是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最宠爱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关箱子的情况。

于是，专案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当年的这个中国情人，而后通过多次追问，这个“情人”终于吐露了真情：她当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确实曾经相爱，并且也认识弗利这个美国军医。就在1941年12月7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及弗利三人，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过一次，直至深夜才赶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国海军驻

天津兵营就突然被日军包围，接着弗利被俘，之后便再也没见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有过接触，更没见过所谓送来的军用提箱。

从所长情人的讲述中可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天，弗利还在北平北海公园游玩，而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这时要么还在秦皇岛，要么还在秦皇岛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弗利当即被俘，而被俘后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样也就不可能拥有箱子。所以这位“情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没有见到弗利送来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长情人没见到弗利送过箱子，并不等于弗利没有送过箱子。因为据弗利后来所说，他被俘后一个星期后又被放了出来，他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将箱子转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专案组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还是没有在原巴斯德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说的箱子。而弗利当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德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证据。

弗利提供的第三条线索是将另两个箱子交给了他最信赖的两个中国朋友。专案组人员通过四处调研，八方查找，终于找到了弗利说的那两个他最信赖的中国友人。这两个中国友人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专案组人员找到他们时，这对夫妻早已离婚多年，原因是建国后有人揭发，说他俩当年里通外国，与美帝国主义有勾结，因而被打成了反革命。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

专案组人员分别赴上海和四川某劳改农场调查，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给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而说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五百美元。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了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五百美元，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行内“背靠背”的办案形式，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再度陷入困境。之后不久，随着“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以及中国政坛万花筒般的翻云覆雨，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北京人”一案，宣告流产。

那位美国纽约的威廉·弗利，也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最终未能登上驶往中国的航班，寻找“北京人”之梦成为泡影。

十几年之后，曾协助天津警方寻找过弗利的张森水，曾借到美国讲学之机，专程到纽约找过弗利，打算就“北京人”一事进一步问询探讨。当他好不容易找到家门时，弗利已经不在人世，他和他所知道的有关“北京人”的秘密，被一同埋进了坟墓。

夏皮罗天津兵营的探访

威廉·弗利的心愿终生未遂，而哈里·夏皮罗却有幸实现了他的中国之梦。

1980年9月16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七十岁的原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有些巧合的是，就在夏皮罗来中国的前三个月，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曾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个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一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1939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得知此情，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得到的最新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吴新智接到夏皮罗言辞恳切的求助信后，觉得此人作为一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古人类学家，虽年逾古稀，却不辞辛劳、不远万里，主动要求到中国来寻找“北京人”，这是什么精神？这或许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的光辉篇章中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于是，便向所里和科学院作了报告。最后，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发去一封邀请函，对方很快

办妥了来华手续。

夏皮罗下榻北京饭店的当天，便与吴新智等人会面。经过短暂协商，双方当即确定了寻找“北京人”的线路：先天津，后北京，再其它。

1980年9月18日下午，夏皮罗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天津自然博物馆黑延易馆长，以及该馆古人类学家黄为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寻找行动。几经查访，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夏皮罗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最后确认，此处与照片上的地点及周围环境吻合。

有些遗憾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尽管原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6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一行人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和埋藏的军用木箱?”校方负责人说：“地震前，没有发现过6号楼地下室铺有木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性格倔强的他来到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上来。

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为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询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位熟悉当地情况者，此人想了想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已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我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得知此情，绝望的脸上又露出了此微喜色。怀着一线希望，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箱子。

夏皮罗没有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7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7号楼里能看出一点什么。”于是，一行人又进入了旁边的7号楼。

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认观察。按理说，如果7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哪怕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很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微低几公分。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去，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就在夏皮罗离去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我为搜寻“北京人“的线索来到了天津，并在自然博物馆找到了当年陪同夏皮罗搜寻的古人类学家黄为龙。在对方的引导下，来到位卫生学校大院，在操场转了一圈后，又走进了7号楼地下室。只见一个个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地下室乱糟糟的房间里酣然大睡。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各室情况不尽相同，但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皆略略低了一些，原来是否曾经铺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改成了水泥地？在场者和学校办公室的人员没人说得清楚，当年的夏皮罗同样未得到答案。

却说从7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如此，这个妓院被当地人称为“美国大院”。夏皮罗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

一行人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

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过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院墙之外，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为龙等陪同者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方面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深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

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个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到时，或许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

就在这位老人转身的一瞬间，他的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进行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夏皮罗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他表示回美国之后继续搜集情报再来中国寻找，但直至1989年离开人世，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夏皮罗去世十年后的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到了前往北京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夏皮罗学生、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巴·尤色福（Bar yosef），向其询问夏皮罗回美国后的情况，尤色福说：“当年夏皮罗先生来中国天津寻找‘北京人’的事，我是知道的，也为那高尚的行为深深感动。但先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似乎始终被一种忧郁的情绪笼罩着，神情忧郁，身体也一下子垮了下来。但也还一如既往地对我们经常提起‘北京人’，直到临终前，还在密切关注着那怕是”北京人”的点滴信息。可谓死不瞑目。”

我相信尤色福所说是真实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为寻找和牵挂“北京人”而死不瞑目者，又何只是夏皮罗一人？

1982年9月18日，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裴文中进入了生命弥留之际。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那瘦弱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的不情愿。他在留恋什么呢？

两年前的秋天，刚从内蒙古考察回京不久的裴文中又东渡日本讲学。在东京大学校园内，他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讲演，并指出，日本旧石器文化的渊源在中国，从而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讲学期间，裴文中没有忘记对朝思梦想的“北京人”的寻访，经过多方探听，终于得到了一点新线索。归国后，他立即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讲学期间，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有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

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资助的复信。裴文中看罢，异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他已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疾病缠身，若单独出门很令人担心，于是都不同意他单独行动，裴文中失去了最后一次亲自赴美查寻的机会。自此，裴文中情绪低落，身体迅速衰弱下去。

1981年2月21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裴文中坐在桌前观看《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略稿，看着看着，他的嘴突然向右发生了歪斜……

他患了脑血栓，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救治。半年之后，勉强出院，但从此再也不能出门了。

1982年8月16日，病中的裴文中勉强提起笔来，给外甥女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这一封信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信中说道，他要静心把病养好，9月份好去柳州，在那儿钓鱼……钓鱼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业余爱好，通过钓鱼调剂疲惫的精神，明年好去满洲里和贵州考察，有机会再好好探寻一下“北京人”的下落……

1982年8月26日，裴文中突然发起了高烧。在家人的再三劝导下，他不得不再次住进了海军医院。在那间不大的病房里，他以孤独悲凉的心境不断地喃喃自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前往探病的亲朋好友一时弄不明白，并不是文学家的老人，为何临终前总念叨这两句诗词？

1982年9月18日12时15分，裴文中突然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他握住儿子的手，颤抖着再也不能挪动的身体，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他79岁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死……不瞑目啊……”

裴文中的亲人以及生前的好友们，多少年来都一直在默默地思索大师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根据裴文中的临终遗愿，大师的骨灰被葬在了周口店的龙骨山下，并将他的祭日改为12月2日——这是大师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日子。他的坟墓旁边，是杨钟健先生的墓地。而另一侧，则是为贾兰坡预备好的一块空地。

当每年的12月2日来临之际，裴文中的亲人和学生们便来到周口店，双膝跪在大师的墓前，尔后点上几炷香火，以慰藉大师的在天之灵。同时，也借以召唤那游荡于天地宇宙间不朽的“北京人”!

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

发现“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裴文中，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与他曾多次叩访过的祖先永久为伴。而活着的人类仍未停止对祖先的敬仰与寻找的脚步，“北京人”的搜寻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位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将要离开人世，急召亲人密友前来身边，对后事一一作了安排。最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侍立床前。

当晚，日本老兵与久三枝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中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一间密室保存，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面对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他于焦急、恐惧与无可奈何中，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密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借助夜幕的掩护，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当一切处理完毕后，他特意用军用砍刀在埋藏地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日后寻找。

当这一切了结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

再之后，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l部队的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真情。而且，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它贵重标本重现人世。

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偷匿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当心中的秘密说出并留下遗嘱后，日本老兵很快去世了。受托的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关重大，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并一度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为了证实那个原日本731部队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悄悄地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地区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的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

经初步观察，此树干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也和那个原日本上尉军医说的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这棵古松的下边就应该埋藏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惊喜之中的仰木道之很快通过有关渠道将听到的线索和自己查寻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作了反映。中科院获知这一情况后，大感意外与惊喜。这毕竟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科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研究员，前往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在的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西路

甲3号，与该公司董事、顾问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的来源已先后经过了几个人转述，到了仰木道之这里已被打了折扣。不过，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作了详细的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张二人只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作实地勘察。

日坛公园位于北京朝阳门外日坛路一侧，又名“朝日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每年“春分”节祭祀大明之神(太阳)的地方。其中日坛的坛，是指一个正方形的石砌台子，称“拜神台”。在方台外围环以红砖墙，东、西、南、北皆有石棂星门。棂星门外又有石砌的“神道”延伸，“神道”四周是成片的苍松古柏。挂映在苍松古柏中的是“具服殿”、“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古建筑。新中国成立后，日坛四周被辟成公园，面积扩大到二十多公顷，成为游人消闲、观光的一个风景区。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很快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一、那个原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糊不清；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日满亲善”，破坏神道与当时的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

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出于对“北京人”的感情与尊重，还是认为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不应错过，且事关重大，在尚未被事实所证实之前，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何况，张森水是裴文中的学生，若真能找回“北京人”，对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莫大的告慰。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和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局作了书面报告。

陈宜瑜副院长接到报告后，出于和叶捷、张森水同样的心情与考

虑，迅即作了两点指示：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此事要保守秘密；二、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张金东处长起草协调调查的具体方案。

1996年5月3日，在张金东的安排下，叶捷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等有关专家经过商议，很快制订了一个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进行“地表探测”的方案。5月8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电震探测组来到日坛公园现场，对事先圈定好的“埋藏”区域进行了探测，认为在11线9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电震探测有异常体，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探测报告，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正式向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和陈宜瑜副院长呈送了《有关发掘工作的设想报告》。路、陈两位副院长当即明确指示：“抓紧时间，严密组织，保证安全，快速解决问题!”

叶捷副所长受领任务后，迅速赶赴日坛公园和该园负责人商谈发掘事宜。意想不到的是，日坛公园的负责人拒绝发掘。其理由是，一旦发掘，将破坏神道和古松，而日坛公园里的神道和古松是万万破坏不得的。面对此情，叶捷只好再三说明发掘、寻找“北京人”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后又几经协商，公园负责人终于同意借助给古树复壮的机会搞点小规模的发掘。

双方协议总算达成，并定于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6月3日上午8时整，原拟定参加发掘的各路人马聚集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楼标本室的会议室，其人员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负责人、古人类专家、高级技师、技工、摄影师、司机等18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文耀和两位地球探测专家以及科学出版社的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有仰木道之、嘉藤刚清和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皈木进三位日本人以及该公司的魏建平。出发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丘占祥主持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大会，并由中国科学院协调发展局局长秦大河作了动员讲话。秦大河对此次发掘充满了期待，他情绪激动地说：“‘北京人’化石自1941年神秘失踪到现在已经是五十五个年头了，自从这珍贵的化石失踪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国际友人曾为寻找一事作了大量的工作，中科院也为此尽了最大努力，但一直没有可靠的线索。这次根据日本朋友仰木道之先生提供的最新线索，前几天我们对埋藏地点作了物理探查，发现情况确有异常。也许，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

真的要回来了，而最早迎接他的就是我们。可见，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迎接这位历史老人时，要注意保守秘密，不要节外生枝，让他再次溜走了。现在领导就在电话机旁守候着，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秦大河说完，中科院科技安全局副局长张青吉介绍了发掘点的保安措施和应注意的事项，随后众人以极其亢奋的心情走出会议室，登车向日坛公园驶去。

此前，中国科学院保卫处处长已带领三名警卫人员率先进驻了日坛公园，并将发掘区域用彩色编织带围了起来，同时三令五申，一律禁止外人接近。当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1996年6月3日上午10时，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首先用铁锹在一棵古柏正南近1.5米的地方，画出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矩形，物探的11线9点就位于这个矩形的中心点上。随后，秦大河和丘占祥挥锹破土。接着四名北京日坛公园的工人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开始全面发掘。

发掘工作按实施计划进行到接近1.5米时，掘进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当挖到2.2米时，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这时，所见四壁出露地层剖面为：0—1.3米为棕黑色表土，其间偶夹瓦砾等。1.5—1.9米为含灰白色钙质结核粉砂质泥岩。1.9—2.2米为灰绿色细砂岩。2.3米开始为原始地层，未见任何曾动土现象。鉴于此，专家们经过商议，临时决定，在坑之东南角再向下掘进59厘米。

遗憾的是，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仍不见一件埋藏物。而事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面对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每一位在场者都心有不甘，又向北壁掘进了60厘米，依然未发现异常痕迹。最后，几名现场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决定，停止发掘寻找工作。此时，叶捷副所长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12时58分。

2小时58分的发掘寻找，就这样无可奈何、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喧腾一时的日坛公园，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历史，似乎再一次同世人开了一个玩笑。

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这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到底是死亡前的梦境呓语，还是歇斯底里的欺世谎

言?抑或干脆就是对中国人一次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

当然，仍有人认为日本老兵临终前留下的“秘密”，还有待于历史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或许是探测仪器不够先进，或许探测的范围出现了偏差，或许发掘的地点不相吻合……总之，此次对“北京人”的寻找与发掘，虽无果而终，却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寻找，它不仅引起了更多局外人对“北京人”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也诱发了无数有识之士对“北京人”下落之谜更深层的思考。

——日本人真的与“北京人”下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吗？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

一张密图暗示的方向

就在日坛人园发掘不久，我再次来到胡承志老人的家中。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和日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图，几年前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便听一位古人类学家谈起，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只是这位古人类学家也只是道听途说，并未亲眼见到这张密图。后来经过一番查访才得知，这张图就在当年为“北京人”装箱，也是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胡承志手上。由于胡老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因而外界并不知这张图到底是什么模样，记载的是什么秘密。

日坛人园发掘的无果而终，促使我再次想起这张秘图，并想籍此就“北京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作进一步探索。感谢胡老的厚爱，当我说出此次来访的诚意后，胡老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把收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草图从一个带锁的箱子里拿了出来。

“这是一位叫皮特森的美国人给我的，快20年了，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从来没给别人看过。” 胡承志摇晃着一个陈旧的大信封说。

“这位皮特森有什么来头吗？”我问。

胡承志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他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有一次皮特森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G.H.R.von Koenigswald）。他向孔尼华谈起自己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我与孔尼华是通过贾兰坡先生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待双方建立联系并相互信任后，他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秘密图”从信封里掏出来，在茶桌上缓缓展开。

这是看上去普通的草图，在一张十六开的纸上，画了十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字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图纸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图。

胡老用放大镜看图纸，解释道："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京查寻'北京人'时，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从这个日本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个美国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国内。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个美国调查官手上得到了它的复印件。"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我问

胡承志想了片刻，道："我这也是个复印件，皮特森之所以要将这张图寄给我，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十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两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你看——"说着将草图推移过来。

我随着胡老手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果然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杠。

胡承志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向我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愚笨的我总算大体明白了这张图的意思。简单说来，这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推测"北京人"去向的示意图。

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人，由于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辨认，应是协和医学院的人；第二人，是息式白；第三人，是德日进；第四人，是裴文中；第五人，是蓝玉田(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人，何博礼(协和医学院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人，博文；第八人，胡顿；第九人，由于个别字迹不清，据胡承志辨认，为一外国医学博士；第十人，马文昭；第十一人，松桥。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重点人物：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地点。这张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地

下室保险库，然后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再后来可能有六个去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某仓库，或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德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不知是个什么地方)。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面对这张草图，我的脑海里当即冒出两个疑点：一是近60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但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直接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到过美国公使馆。二是这张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将中英文同时写得如此不凡，可能吗?

当我把自己的怀疑与思考提出后，胡老说：“送美国公使馆的事，没有一个中国人见到，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到底送了还是没送，我不清楚，恐怕裴文中也不清楚。”

当我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然后说：“我也觉得奇怪，这图上的英文和中文看起来都不像是日本人写的。”

“那您看像哪个国家的人写的呢?”

“我看有点像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我有些吃惊地抬头望着面前这位和善的老人。

胡老说：“我只是这样猜测，但没有根据，只是感觉。因为日本人写的字笔画大都很硬，而这上面的中文字写得很潇洒，很漂亮，英文字也写得不错，一般的日本人是写不出这么好的英文的。从英文的笔体来看，有点像搞财经之类的人写的。”

显然，如果这张图上的字不是日本人写的而是中国人写的，这个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当年若是没有参与日本宪兵队对“北京人”的搜查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画出这张草图的，更不可能准确地写出每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姓名。那么，画出这张秘密草图的中国人——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又是谁呢?他或她当年在搜查“北京人”的过程中，扮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张秘密搜查图出自日本著名侦探锭者之手。虽然并不知道锭者的中文写得如何，但他的英文却很不错，这是当时的中国科学界许多人知

道的事实。

临走的时候，胡老表示可把此图送给我，或许以后还用得着。我怀着感激之情接过了胡老送来的充满了信任与期待的特殊礼物。

回到家后，在寂静的夜晚，我独自展开这张草图，再次进行仔细慎密地观察、分析。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胡承志将“北京人”装箱并交到博文手上后，博文并没有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直接送到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其理由和根据是：1．图上只有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路线图，没有地下室到美国公使馆的路线图；2．日本宪兵队列出的14个追查人员名单中，也没有一个是美国公使馆的人；如果博文确实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话，公使馆肯定会有具体的接收人，这个接收人也肯定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因此，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的说法，不攻自破。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我再次打电话给胡承志，希望他就此事再查阅一下有关信件。第二天，胡老告诉我说，他仔细查阅了皮特森给他的所有信件，其中一封信中明确说，据那个美国调查官员讲，博文没有先将“北京人”送到美国公使馆，而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了美军陆战队兵营。

至此，半个多世纪的谬传终于得以澄清，我为此长长出了一口气——后来的“北京人”搜寻者，可以不必为这一点再费尽心思而把精力用到别处了。

这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草图，的确为“北京人”的去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解开了关键的一环，但遗憾的是仍不能由此推断出“北京人”的真正下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平搜查“北京人”的确下了一番苦功，而找到“北京人”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那么，“北京人”是否真的在日本人手中呢?

难忘的长春之夜

当历史的脚步即将迈过20世纪门槛，新世纪的曙光已映照全球时，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回顾与探讨，人们对“北京人”的渴望与寻找，似乎比以往更加强烈。当年在周口店那个荒凉的山野深处，继裴文中之后于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更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1998年，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贾兰坡，已是91岁高龄。在人类的生命史上，这无疑是个少有的年纪。

同裴文中晚年一样，面对匆匆掠过的时光和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状况，“北京人”的下落问题，越来越令贾兰坡挂念并为此焦虑不安。这种情愫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心中膨胀，使他经常为之彻夜不眠。有时在梦中突然看到“北京人”就在眼前的某个角落，而伸手索取时又神秘地消失于一片茫茫不可辨的混沌之中，为此，他常常半夜惊起。

不堪忍受这种心灵与精神折磨的贾兰坡，强撑着身体，于1998年夏季，与14位志同道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寻找“北京人”的倡议书，呼吁全世界人类立即行动起来，在新世纪的光照中，共同携手寻找失踪达57个春秋的“北京人”。倡议书通过媒体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不只是贾兰坡与14位院士的心愿，它同样代表了具有文化良知和精神追求的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希望。

于是，中外人士纷纷加入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之中，并以各种方式为这一世纪末伟大文化行动，尽心尽力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发表自己的推断和意见，从而再度掀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热潮。就在这股热潮中，一个日本人和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中外科学界的注意。

——此人的名字叫中田光男。

1998年10月28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座公寓里，已是80岁高龄的中田光男正在书房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家人将几份刚收到的报纸送了进来。中田光男顺手拿起一份《朝日新闻》，当他刚翻到国际新闻版时，一则消息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消息是《朝日新闻》驻华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电传稿，标题是：《揭开世纪之谜，寻找“北京人”化石》。文中说：中国科学院91岁的贾兰坡院士仍没放弃在有生之年找回遗失的“北京人”的愿望。日前他联合14位中科院院士在新闻媒体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北京人”的下落，积极提供有效线索，力争让“北京人”早日回到现代人类的怀抱……

据中田光男后来说，他看罢这则消息后，不知什么原因，心里一下受到很大刺激，周身的血液仿佛要沸腾起来。他再也无法安心写作了，压抑已久的思绪不由自主地便回到了53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之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时年23岁的中田光男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刚一毕业，便被派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本部情报部从事搜集、研究苏联红军情报工作。在华期间，由于中田光男为日本关东军提供了不少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曾受到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嘉奖。

1945年8月，随着“蘑菇云”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升起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崩溃。日本关东军官兵除大部分被苏军俘虏外，剩余的军政要人和官兵仓惶逃命。侥幸未被苏军俘虏的中田光男，也与溃败的队伍一起，踏上了狼狈而又艰辛的逃亡之旅。

就在这次逃亡中，与中田光男紧紧相随的，是他的一个名叫山口本秀的部下 (南按：因真名不宜公开，受中田光男先生特嘱，山口本秀为化名)。途中，二人几经商议，决定先去长春山口本秀的岳父家中暂避。

于是，经过几昼夜胆战心惊的奔逃，二人终于辗转逃到了长春，在山口本秀的岳父远藤博士家中暂时隐居下来。

远藤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留学美国，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他被派往中国担任伪满洲自然博物馆自然科学部部长，专门从事地质、考古、古人类学研究。此次女婿和中田光男的突然到来，既为他带来了一份惊扰，又为他平添了一份乡情。正是这位古人类学家和两个情报人员的意外相逢，演绎出了一连串奇特而神秘的故事。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在远藤家中躲藏了三天三夜，感到这样下去不是最佳办法，因为远藤本人也同样陷入了危险的旋涡，整个东北乃至中国已不可能再是日本人的长居之地。面对大势已去的败局，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化装成商人先离开长春，而后再由大连乘船逃亡日本。这个计划得到了远藤的赞同。

想不到就在临行前的晚上，奇特的故事发生了。

那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夜晚，远藤与中田光男、山口本秀二人交谈至深夜，主要话题自然是关于战争、日本的败局以及各自今后的命运与归宿等等。据中田光男后来回忆，这个晚上他们三人的脸上都刻满了惊恐与悲壮，对今后各自的命运谁也没有把握，每个人的心里仿佛都压着一块石头，沉重得让人难以喘息。可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远藤突然对他二人说：“我拿一件稀罕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远藤说完，起身走进他的书房。不一会儿，搬出来一个半米见方的木箱子。远藤麻利地打开箱子，从里头取出一个30厘米见方的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借着幽暗的灯光，那包裹着的盒子在远藤手中被层层揭开。当最后一层白布揭掉时，蓦然出现在二人面前的，竟是一个茶色的骷髅!

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由于事先没有心理准备，被眼前的骷髅惊得目瞪口呆。远藤望着二人惊恐的样子，微微笑了笑道：“别怕，这可不是你

们关东军司令官的头，他的头没有这么宝贵。告诉你们，这就是举世闻名的50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真的?!”中田光男顿时惊愕不已。此前，对中国的“北京人”他虽久仰大名，但这“北京人”头盖骨到底是什么模样、什么颜色，却一概不知。后来由于他所学专业和特殊工作性质的关系，“北京人”的事儿也就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了。没想到自己在这生死未卜之际，竟有机会一睹“北京人”头盖骨的尊容，令他感到意外又惊喜。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它带回日本。”远藤继续说道，“这件东西我是从来不让外人看的，今天晚上你们看到了它，这是你们的福气。不过你俩要发誓，今后不管日本政局和你们本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不测，都不许告诉任何人。”远藤脸上的笑容很快被另一种复杂的神情所替代。

面对远藤那既信任又警觉的目光，中田光男怔愣了好一阵子，才缓缓说道：“远藤先生，请您放心，我们会按您说的去做的。”接着，站在身旁的山口本秀也跟着咕噜了一句大同小异的话。

随后，远藤又邀请中田光男出门散步。当时，长春已被苏军占领，市内治安极其混乱，日本人一般都不敢在夜间行走。由于中田光男懂俄语，可以与苏军沟通，因而二人并不太感到可怕。当走了大约三十分钟后，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名年轻女子伫立路旁，远藤向中田光男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请不要告诉我的妻子。”中田光男意识到，此女子不但与远藤是情人关系，很可能还与“北京人”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长春之夜在远藤家的这一幕虽说突兀而又短暂，却给中田光男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半个多世纪后他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第二天一大早，中田光男和山口本秀离开了长春，向大连方向逃去。之后，二人又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历程，终于在1946年初回到了日本。

中田光男回国不久，进入内阁调查室，仍从事对苏联情报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56年，日苏两国开始恢复正常谈判，作为研究苏联问题专家的中田光男，对日本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的让步与妥协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批评性文章。该文发表后，引起了日本政府当权派的不满。不久，中田光男被迫退出内阁调查室，创办了苏联问题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继续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直至1988年退休。

退休后的中田光男转行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研究工作，在日本颇有一些影响，1997年还被中国教育学会脑映像开发研究会聘任为理事长。

1998年，已是80岁高龄的中田光男，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50年前的长春之夜在远藤家看到的那一幕，随着年岁的增大、时间的久远，竟越来越清晰地在脑海活跃起来，好像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当贾兰坡等中国科学家呼吁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突然出现在中田的视野中时，他禁不住站起身来，情绪激动地在书房里踱开了步子，他望着阳光照耀下的东京楼群，突发奇想，脑海中蓦地闪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自己何不立即行动起来，响应中国科学家的号召，去帮助找回这一人类至宝“北京人”?也许，那个在自己心中隐藏了53年的秘密应该到了公布于世的时候了，“北京人”这一全世界关注的谜案说不定就在自己的手中得以解开。而1999年既是本世纪将要结束之际，又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假如上苍有眼，历史有情，让自己在这千年晚钟敲响的前夜找回“北京人”，那完全可以在中国庆祝五十周年华诞那天，怀抱失踪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人”信步登上高高的天安门城楼，然后亲自将“北京人”这一举世瞩目的人类瑰宝奉送到中国主席的手上。到那时，全世界一定会为之震颤不已……

面对如此光辉的前景，中田光男不好意思地再想下去了。他知道，若自己拿不出真正的“北京人”，不管梦想多么伟大辉煌，但终归还是一个梦。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北京人”的下落。于是，他以几十年搜集情报的工作经验，开始了秘密行动。

老特工的寻访之路

中田光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回忆出53年前他在长春远藤家看到和听到的有关“北京人”头骨的每一个细节。遗憾的是，由于远藤和山口本秀均已谢世，无人帮他印证回忆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更没人给他任何启发和提示，他的回忆只能断断续续地在痛苦与欢愉中交替进行。当他把能够回忆起的每一幅历史画面全都回忆出来后，又用文字作了详细的记录，作为日后寻找的根据。

在如此日复一日的回忆和记录中，中田当然不会忘记自己与远藤的第二次会面。那是1948年6月，远藤从中国返回日本后，曾在东京三鹰小学的一处住宅里作过短暂的停留。中田光男闻讯后，专程前去拜望。二人见面后，除了述说离别之情与各自在返回日本途中所经历的磨难与惊险外，自然也谈到了“北京人”头骨问题。中田光男清楚地记得，当他问远藤“北京人”头骨是否已带回日本时，对方连连点头说：“带回来了，带回来了!”说着，起身带他走到一堆行李前，指着一件被军用毛毯紧紧包裹着的东西说：“它就躺在这个包里，我正考虑如何处理它呢。”

几天后，远藤离开了三鹰小学，去了位于东京北部地区的埼峪大学。在之后的若干年里，远藤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并先后出任过考古系主任、大学校长等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去世。

中田光男和远藤的这次相会，是二人的最后一面，所涉及的“北京人”问题，也是极其有限而肤浅的。至于远藤后来对“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了怎样的“处理”，他不得而知。因此，面对自己回忆出来的历史，中田感到既有合理的东西，又有不少困惑之处。他不明白当年那个亡命天涯的长春之夜，远藤为什么会突然拿出“北京人”头骨给他们看?是为了缓和当时压抑、惊恐的气氛，还是另有原因?远藤是怎样得到“北京人”头骨的?最后到底又作了怎样的处理……于是，他决定先到埼峪大学作一番调查。

不尽人意的是，当他来到埼峪大学后，由于远藤已去世多年，许多线索已不可寻觅。埼峪大学考古系几位健在的老先生说，他们从未听说、更没见过远藤带回了“北京人”头骨，只知道远藤退休后，有一位员工曾为他清扫过办公室。中田光男又找到了这位员工，但对方告诉说，他当年清理远藤先生的办公室时，没有发现什么木箱，更没有发现什么“北京人”头骨，远藤本人的大部分遗物都是由他的外孙阿部清理和保存的(南按：处于本故事结尾处的原因，遵中田先生嘱，阿部为化名)。而阿部并不在埼峪大学，一直在日本东北大学任教。

为搞清历史线索，中田又赶往日本东北大学。

可谓无巧不成书。中田要找的阿部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从中国东北逃亡长春的部下山口本秀的儿子。山口本秀早已作古，而他的儿子此时也年过半百。望着阿部教授这位华发已生的晚辈，中田想起53年前和他父亲逃亡的惨景，不禁黯然神伤，嗟叹不已。他颇为感叹地对阿部说：“时间真是流逝得太快了，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失，似乎只是瞬间的事情！”

中田光男后来说，他与阿部的第一次交谈，刚开始是亲切、美好而又融洽的，但当话题扯到远藤从中国带回的那个木箱以及木箱里装的“北京人”头骨时，气氛似乎就变得有些尴尬和复杂起来了。他尽管曾是搜集、研究情报和谈判的高手，但在与阿部的交谈中，却没有取到事先设想的效果。阿部明确告诉说，关于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他外公远藤和父亲山口本秀健在时，他本人既没听外公说过半点信息，也未得到父亲山口本秀关于此事的任何一句遗嘱。他虽然确实对外公远藤先生的遗物负责进行过清理，却没有发现所谓的木箱和“北京人”头骨。

至此，线索似乎中断了。

但中田寻找的希望并未因此而破灭。他回到东京家中，对此次的调查过程作了冷静的思考与分析。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远藤当年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这件事，阿部应该是知道的。何况，他从阿部与他会面的言谈举止中，隐隐感到其人内心深处似乎隐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又会是什么呢?

中田光男通过此次调查知道，远藤仅有一女一男，女孩为大，男孩为小。女孩嫁给了山口本秀，男孩则在12岁那年暴病夭折。于是，大女儿以及外孙阿部便成了远藤一生中最亲近的人。远藤去世后，阿部是远藤财产的惟一继承人。既然有了如此一种血缘关系作基础，远藤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阿部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便远藤生前守口如瓶，临终前也应吐露真情。莫非远藤真的将“北京人”的信息带进了坟墓?

中田光男毕竟是日本关东军搞情报的老特工，他决定对一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先从外围打开缺口，然后再逐步向真相逼近。于是，他很快找来一本又一本书籍和资料。通过一段时间的查看和分析，感到起码有两个问题是疑点：其一，他在长春看到的远藤手中的那个“北京人”是个完整的头骨，而据书籍和资料记载，中国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只是一块头盖骨，不是完整的头骨，二者为什么出现了差异?其二，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说，“北京人”是在北平从美国人手中丢失的，若真的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也该落到驻华北的日军手中才对，怎么会插翅跑到了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的手中?

当中田光男查看日本考古学家松崎撰写的《北京原人》一书时，却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即松崎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挪野的日本关东军中将。该书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左右，挪野中将曾带领一个日本大尉和其他几名军官前往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取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块头盖骨先是保存在关东军司令部，后来就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和什么人的手中去了。该书还说，挪野中将到协和医学院取头盖骨时，中国的科学家裴文中也在现场。而随同挪野去取“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大尉，后来受到了关东军的处分，原因不明。

松崎在他书中的这段记载，此前没有任何人涉足，也许算得上一则“独家新闻”。但，松崎说挪野中将拿走“北京人”时裴文中也在场，显然缺乏根据。倒是中田光男从一名研究日本关东军问题的学者那里得知，挪野中将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爱好者。因此，如果松崎对挪野与裴文中的记载是个错误，则不必考虑这条线索。若记载属实，那么挪野中将与远藤之间就有可能构成一种链条关系。尽管松崎在书中没有提到挪野与远藤是否相识，但就一般推论，作为古生物爱

好者的挪野中将和作为著名古人类学家的远藤相识或是好友，当是可能的。假定挪野中将此前与远藤交往密切，当关东军危机四伏之际，他将“北京人”转交给了远藤保管，也是可能的。

问题是，远藤1948年回到日本后至离开这个世界前，对手中的“北京人”会作怎样的“处理”呢?

就当时日本的情况分析，盟军早已占领并控制了日本的一切。日本在战争期间从别的国家抢夺回去的各种物品，都已受到了盟军的追查并被清退。据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后来透露，与“北京人”失踪事件有关的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并未远离东京，他俩当时被美国人关了起来，连与二人有关联的铃木尚等著名教授，不仅被盟军清查了办公室，甚至连家也给抄了。这些情况想必远藤是不会不知道的。

那么，当他得知这些险情后，必然要为自己好不容易才从中国带回的“北京人”的命运担心。在焦急、忧虑中，很可能出现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其毁掉，来一个查无对证，使自己完全摆脱险境；二是找一个秘密地点隐藏起来，等将来时局有所变化再作打算。

很显然，远藤作为一个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无疑会选择后者。

假如这一推理成立，那么，远藤会将“北京人”秘藏在什么地方呢?

当年长春之夜给中田光男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远藤亲吻“北京人”头骨这一奇特的细节。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细节的苦思冥想和反复推敲，中田光男终于做出了如下推论——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当时的处境，远藤若将“北京人”藏于家中或者埼峪大学某处，是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远藤将“北京人”头骨埋藏在了他那12岁即夭折的独子的墓穴之中。因为远藤最疼爱的独子夭折于12岁那年，“北京人”也恰恰是面世12年后丢失。远藤当年在长春之夜又有亲吻“北京猿人”头骨的亲昵举动，可以看作这个亲生儿子和“北京人”在远藤的心里已是难解难分。或者说，远藤已把“北京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了。

根据这一大胆推测，中田认为首先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惟其如此，方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于是，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东北大学的阿部教授以及与远藤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亲属，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意图，希望在日本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秘密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对历史作一个公正的了断。

然而，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无奈之下，中田光男又找到了日本众议院议员平沼赳夫，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去劝服阿部教授及远藤的其他亲族，支持他那个刨坟掘墓的计划。

作为好友的平沼赳夫对中田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对刨坟掘墓一事深感为难。因为在日本要掘一座坟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既牵涉法律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以及死者亲属的感情等问题，一旦真要实施起来，是相当棘手的。所以，平沼赳夫向中田光男授意，让他找机会到中国去一次，将自己所掌握的线索奉献于中国科学界。如果中国科学界认为有价值，可促请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提出掘墓的请求。到那时，日本再以政府的名义和阿部等人商谈，这样，此事或许有望得到解决。

中田光男听从了这位好友议员平沼赳夫的劝说，作着与中国方面接触的准备。经过一系列筹划与努力，终于同中华日本学会取得了联系。于是，1999年9月17日，中田光男从东京踏上了飞往中国北京的航班。

难以破解的墓穴之谜

来到中国后，中田下榻于北京凯莱大酒店。前来迎接他的，是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科院研究员周季华教授。当晚，中田光男便将自己隐藏了53年的有关“北京人”秘密线索和现在的寻找计划与周季华作了详细的交谈，恳切地希望周能与中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促成此事。

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周季华听罢对方的一番言谈，心中异常激动。他知道，尽管“北京人”是全人类的财富，但它首先属于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协助有关方面找回“北京人”，自然是件很荣幸的事情。于是，他很快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叶捷取得了联系。

叶捷听后极为重视。翌日晚，便同本所的古人类学家董兴仁一起前往凯莱大酒店，与中田光男进行了会谈。中田除了将自己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线索和盘托出外，还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从而促成将远藤儿子的墓穴掘开的计划。而后，叶捷和董兴仁就“北京人”的一些具体问题又作了进一步交谈。当叶捷问及对方当年看到的“北京人”是什么形状时，中田从行李包中取出了日本考古学家松崎所著的《北京原人》一书，指着印制在此书封面上的一张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图片说，他当年从远藤手中看到的“北京人”化石，与这张图片极为相似。

很显然，《北京原人》一书封面上的图片是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头

骨，而叶捷、董兴仁两位专家知道，中国当年失踪的“北京人”是一块头盖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头骨，这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中田则推测说，远藤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后，有可能别出心裁地给它作了修复，从而使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头骨。但叶捷和董兴仁仍认为这种推测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缺乏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而任何一个科学的论断都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最后，双方商定，次日共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让中田的记忆与实物来一番对照，以进一步印证其线索的真伪。

9月19日，中田在周季华的陪同下，同叶捷、董兴仁等专家一起驱车来到周口店。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里，中田光男仔仔细细地看着每一件陈列的化石标本，也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当中田的目光与六个静卧于玻璃柜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相遇时，没作任何反应。而当他来到一个头盖骨、下额骨和牙齿等都较完整的头骨面前时，禁不住停下脚步，眼睛蓦然一亮，伸手指着那件头骨说：“对，就是它，我当年在远藤手上看到的那个头骨和这个头骨极其相似！”

“中田先生，您认为您的记忆可靠吗?”身边的叶捷问。

“我相信我的记忆没错！” 中田光男肯定地说道。

叶捷点了点头，将中田重新领回刚才已经看过的六个“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玻璃柜前，然后指了指说：“很遗憾，中田先生，我们当年丢失的‘北京人’，就是类似橱窗里躺着的这些头盖骨，而不是你刚才所指的那件完整的头骨!”也就是说，中田当年从远藤手上看到的“北京人”，有可能是假的“北京人”!

中田点点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凉：“叶先生，我相信您说的是真的，可我当年看到的的确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对这个差异，我想除了远藤先生后来做了修复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叶捷急忙安慰道：“没关系，中田先生，不管您提供的这条线索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十分感谢您，因为您毕竟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当然，事情的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调查和考证。”

中田光男的搜寻工作至此暂告一个段落。

至于中田光男请求中国政府用外交手段和日本政府交涉，以便刨开远腾之子墓穴之事，中国科学界高层表示应持慎重态度。所谓“外交无小事”，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的句话，也是事实所在。一旦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很可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反而不如民间渠道更为有利。因为要发掘远藤儿子墓穴，此事非同小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对于死者

的墓地，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作保护，即使中国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也未必如愿。再说，假定交涉成功了，远藤的亲族也同意了，墓穴一旦打开，而里边却没有“北京人”又怎么办?

鉴于上述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方面认为，此事应继续调查、考证，切忌贸然行事，等真有把握之时，再作打算也不为迟。当然，如果中田光男自己能说服日本政府和远藤家族，掘开其子的墓穴，那又另当别论了。

作为积极倡导寻找“北京人”的贾兰坡，对中田光男提供的这一线索和中国之行，自然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和见地。当我通过周季华教授访问了中田光男，并向贾老就这一问题进行请教时，贾老说，中田光男提到的那位远藤先生，确有其人，而且还接触过。日本侵华期间，远藤曾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持和参与发掘过一大批古生物与古人类化石，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在中苏边界的内蒙古发掘的那几个扎赉诺尔头盖骨化石。这些发掘出来的扎赉诺尔头骨化石，除裴文中从远藤手中要回一个放在新生代研究室研究以外，其它的一直由远藤保管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二战结束后，这批扎赉诺尔头骨下落不明。贾兰坡还透露，在1941年前，远藤多次从长春来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并与贾兰坡相识。“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也曾来过，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根据贾兰坡的说法，既然裴文中能从远藤手中要回一个(南按：当我就此问题请教胡承志时，胡老说，1947年他在新生代研究室看到的是两个扎赉诺尔头骨) 扎赉诺尔头骨，可见远藤与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其他中国科学家的确是相识的，甚至有着良好的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裴文中能从他手中要回扎赉诺尔头骨和远藤经常到协和医学院做研究这一事实。从而可进一步推断远藤和挪野中将彼此也可能相识。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在《北京原人》一书中关于挪野中将前来协和医学院取走了所谓“北京人”头盖骨一事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只不过挪野中将拿走的很可能是扎赉诺尔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而远藤发现的扎赉诺尔头骨除送给了裴文中一个（或两个）以外，剩余部分仍保留在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里。因此，中田光男当年从远藤手中看到的，很可能是经过远藤修复之后的扎赉诺尔人头骨，而不是“北京人”头盖骨。

然而问题是，远藤作为一个颇有名望的古人类学家，自己明明拿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为什么非要在中田与女婿面前炫耀自己手中握有“北京人”头盖骨呢?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据贾兰坡说，远藤

本人在“北京人”丢失前夕曾来过协和医学院搞研究，他在这段时间里到底都“研究”了些什么?是否也染指过“北京人”?没有人说得清楚。因此，在事实尚未完全搞清之前，很难排除远藤手中确实握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而贾兰坡为此事曾专门找到胡承志进行探讨，并承认，中田当年在远藤家中看到的装有头骨的箱子内塞满了脱脂棉这一细节，与事实吻合，“北京人”化石被业内人士收藏，其可能性不能排除。

作为一名日本的老特工，中田光男对中方的种种反应，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从周口店返回北京后，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是又在北京走访了几家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就掌握的线索再作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支持他寻找计划的合作伙伴。同时，他还委托周季华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健在的老人联系，希望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进行交谈。遗憾的是，由于贾兰坡当时身体欠佳，面谈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81岁的中田光男的到来，还是在北京各界引起了反响。中田本人在离开中国前表示：回国后他还要为此而不断努力，尽量说服日本有关部门和远藤的家族打开墓穴，一旦时机成熟，他将再来中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等专家会面，直到揭开远腾儿子的墓穴之谜为止。

魂归龙骨山

1999年12月，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邀请，中田光男前往中国并出现在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北京猿人第一颗头盖骨发现七十周年会议”的开幕式上。上次中田先生来华时，曾受到了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与贾兰坡和胡承志未能会面。中田此次来华，在邀请方的精心安排下，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1999年10月14日上午，92岁的贾兰坡在儿子兼秘书贾贾彧彰的搀扶下，首先来到了新浪网站聊天室，随后，81岁的中田光男和86岁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三位老人——当年的“冤家对头”、今日的“中日好友”见面后，相互握手，彼此问好。而后，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围绕中田所提出的“北京人”线索问题，面对众多在线网友，开始交谈。最后，就中田所见的头骨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光男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藤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并据此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自然博物馆保管，后来就到了远藤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定，认为对方提供的《北京原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

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表示，虽然中田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藤手中掌握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是值得整个人类为此寻找下去的。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国际学术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无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2001年4月2日，《北京晚报》在头版以显要位置登出《国宝贾兰坡病危抢救》的文章，文中称：“‘我今生今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遗失的北京猿人头骨，这几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带着这永远的牵挂的贾兰坡院士，今天躺在北京医学院的病房里，这位93岁的老人，因突发脑溢血，现在已处于昏迷状态，要靠气管和呼吸机维持正常呼吸。”

1929年，作为原籍河北玉田县的贾兰坡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两年后就职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并被委派到周口店协助裴文中从事遗址的发掘管理工作。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举世为之震动。此后的几十年岁月，贾兰坡一直从事周口店发掘与研究，并主持指导了中国大陆范围内的丁村、匼河、西侯渡、蓝田、峙峪、许家窑、萨拉乌苏、水洞沟与泥河湾等一系列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由一个中学毕业生和不懂化石和石器为何物的练习生，终成一代杰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和第四纪地质家、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和爱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创造了一个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与夹缝中刻苦进取，及时把握机遇并靠个人不懈努力实现自我价值重大转变的人生传奇和近似科学界的神话。

根据老人生前遗愿，遗体火化后骨灰葬在周口店龙骨山——那块政府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墓地，在祖先的居处与当年的师友杨钟健、裴文中相临为伴。

哀乐、泪水、换联、鲜花……像当年的裴文中一样，贾兰坡的灵魂在送葬队伍的阵阵哀鸣与泪水飞溅中，带着事业的巨大欣慰与寻找“北京

人”未果的遗憾，悲欣交集地向龙骨山——人类祖先的圣地，飘然而去。此情此景，不免令人忆起埃及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自传的回声》中那深情婉约的绝响：“我伤感地闭上眼睛，却看见为我出殡的队伍正在行进。我走在队前，手执一只斟满生命醇酿的大杯！”

斯人已去，巨星殒矣。神秘失踪的“北京人”是否还能回到人类的怀抱，以慰逝者的在天之灵？

尾 声 归来兮，“北京人”

若从20世纪初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来华之日算起，寻找“北京人”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两个世纪的92个年头。

若从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算起，“北京人”丢失的时间至今已有整整65个年头。

65年来，全世界对“北京人”的寻找，可谓故事不断，高潮迭起，“北京人”不但没有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令人刻骨铭心。

然而问题是，希望一个一个地升起，又一个一个地失落，真正的“北京人”到底仍在这个世上，还是已被毁于战争?如果仍在这个世上，到底又在哪里?若早已不在人世，又毁在谁的手里?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北京人”的下落，各种不同的说法多如牛毛，而最能随意想象、胡编乱造，甚至如神经病般胡言乱语，装疯卖傻，不断拿中国人涮火锅者，当数美国人。

在这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诸多说法与妄语中，略加筛选概括，无非是“被毁”和“存在”两个大的系统。就我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调查访问得到的线索推断，我坚信“北京人”仍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生存着。其主要理由是——

一、“北京人”不可能自毁。“北京人”的转运工作有着严密的计划。其运往美国的计划，是经过美国人和中国人事先一起策划，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就作好了安排，事后的一切也是按计划进行的。因而，即使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突遇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人遇到了麻烦，但“北京人”是决不可能从他们手上随便扔弃的，更不可能自毁。

二、“北京人”不可能被毁。“北京人”的包装相当精细、严谨、奇特，与其他物品不可相提并论。可以想象的是，随着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美国人在转运“北京人”途中，将会出现下面几种情况：1．美国人自己悄悄将箱子作了转移；2．箱子被日本人当作战利品缴获； 3．美国人或日本人将箱子就地埋藏；4．美国人自顾不暇将箱子无意失落。如果是第1种情况，无论通过何种渠道予以转移，也不管转移至何处，两个箱子同样不会被毁；如果是第2种情况，即使是最愚蠢的日本兵也会知道，在如此紧张的情形下，美国人从中国带走的肯定是有价值的东西，装有“北京人”的箱子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不会摧毁它；如果是第3种情况，无论是被发现还是没有被发现，由于两个箱子包装非同一般，也会继续在某一个角落里安然无恙地存放着；如果是第4种情况，同样也会因为两个箱

子包装严密而奇特，无论是日本兵，还是中国人相遇，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里面的东西为什么会如此小心严密地包装?既然包装得如此之好，肯定珍贵无疑。即便对“北京人”一无所知，也会先保存起来，或请教上司，或询问他人，或找人收购，或秘密收藏，决无挥枪弄棒打个粉身碎骨稀巴烂的道理。

那么“北京人”到底会在哪里呢?

我的推断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日本，其次是中国，再其次是美国和法国。

在日本的理由是：“北京人”失踪之前，紧紧盯住“北京人”的，首属日本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最先追查“北京人”的，同样是日本人，并且兴师动众，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除了中国的胡承志跑掉以外，其余凡是与“北京人”有关的美国人和中国人包括美军陆战队官兵，全都被日本人抓了起来或受到监控。而当时的平津地区已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无论是死者还是活物，均逃不出日本人的魔掌。何况，当时还有日本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的消息，以及此后日本人再也不找的事实。更有盟军在日本找到了“北京人”的新闻报道，以及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隐居乡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

与这个推理相关联的是，1994年4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在法国巴黎拜访40年代比利时驻中国公使纪佑穆之子菲利普时，对中国很有感情而又酷爱中国文化的菲利普亲口对韩伟说：“我一直想告诉中国人北京猿人头骨的下落，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法国牧师卡尔丹夫妇曾经参加过北京猿人的发掘。为了保护这份世界财宝，卡尔丹夫妇将北京猿人头骨等包装入箱准备运出时，却被日本人掳去了。这是我的父亲亲眼看见并不断给我们讲述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北京猿人头骨应该到日本去找!”韩伟听了后，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是否可靠，还当即问了菲利普一句：“此话可否公开发表?”菲利普斩钉截铁地表示：“当然可以!”

这一线索之所以被我提及，是因为法国牧师卡尔丹夫妇的确存在转运“北京人”的可能。理由是——卡尔丹夫妇和当时在华的科学家德日进当时同为驻中国的法国人，卡尔丹夫妇既然参与过周口店的发掘，必然与德日进有不错的交情，至少熟悉。而德日进作为发掘周口店的顾问，不仅深知“北京人”的重大价值，而且无论在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面前都有很高的威信，因而对“北京人”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南按：由胡承志做的“北京人”模型就在他手中控制了一段时间)。那么，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后，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被日军俘虏，再也无力承担护送“北京人”至美国的重任时，德日进挺身而出，让既知道“北京人”价值又懂得如

何保护“北京人”的卡尔丹夫妇以牧师的身份出面转运也是可能的。此前就有人怀疑德日进曾染指过“北京人”，此说同样是一个佐证。因而，菲利普说自己的父亲亲眼看见日本人从卡尔丹夫妇手中夺走了“北京人”，似乎不是天方夜谭。

关于“北京人”可能在中国的推断有三，一是被美国人或者日本人埋藏在了中国的某个地方，如日本原731部队那个老兵所说的情况；二是从美国人或日本人手中有意无意落在了或者转交到了中国人的手上；三是有中国人乘战乱之机，混水摸鱼，从中搞鬼。由于“北京人”失踪的发生地在平津地区，因而转运途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有被搁置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或者任何一个人手中的可能。例如，美国军医威廉·弗利所说，即其一个例证。或许，像当年那对替弗利保存过箱子的夫妇一样，由于中国后来的政治动乱，知情者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收藏的“北京人”也随着不断的抄家与破“四旧”而落于垃圾堆零落成泥辗作尘了。

关于“北京人”可能在美国的推断有两种可能：一是假定日本人当时没有从北平追查到“北京人”，那么美国人就有可能通过别的途径、别的手段转运到美国。当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盟军的代表，有可能从日本人手中没收了“北京人”而占为己有。但这种可能性明显地要小于在日本与中国。

当然，最近有消息说，“北京人”当年被装到了一艘叫做“阿波丸”的日本轮船中，。“阿波丸”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远洋邮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海域。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并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全船乘客及船员共2009名，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于难。

就在“阿波丸”沉没三十年后，在日本人的暗中操纵下，世界媒体开始旧事重提，并很快炒作成一个新闻热点。据美国《共和党报》1976年11-12月号特刊报道，“阿波丸”上装载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大捆纸币价值不明，人工制品、工艺品、宝石40箱，价值不明。据一位叫那托思的原美国原海洋实验室观察员、国家潜水领导成员在打捞计划中列明，最低可打捞货物价值为2.49亿美元，所有财富价值高达50亿美元。而据台湾《中国时报》1976年11月21日报道说：“阿波丸”被击沉时载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

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等等。

后来的日本海湾代表团向中国提供的数字为：锡3000吨，生橡胶3000吨，加上锑、钨、水银，总计9812吨。

据说，除了这些金银财宝外，“阿波丸”沉船中还有一件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特殊礼物送给中国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极有可能在“阿波丸”沉船上。

针对这一说法，许多人提出疑问：日本人为什么要颇费周折将化石从中国北方运到东南亚，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或是神经病吗？

但这一系列耸人听闻与神乎其神的传言却被中国官方信以为真，并组织一支人马下海打捞。此次打捞共捞获锡锭2472吨，售价5000余万美元，还有橡胶等货物数千吨。 另外从中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人物郑禹(奉天市长，伪满元老郑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等物，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郑氏曾任伪满州国总理大臣，1938年死于长春，后葬于沈阳。史料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将在中国北方搜罗的文物宝器运上了“阿波丸”轮船——这便是推测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藏匿其中的所谓“旁证”。

然而，打捞者费尽财力与精力，却始终没有在这艘已沉入海底泥沙下9米多深轮船上找到黄金，更没没有发现半块“北京人”化石的踪影，却打捞出一批遇难者的遗骸。中国政府本着中日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先后于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在上海以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公司的名义，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打捞出水的“阿波丸”死难者遗骨和遗物，日本人颇具悲哀状与感激之情地一一“笑纳”了。当这种场面反复出现时，有智者方蓦然醒悟：此前关于这艘沉船内装有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的种种神话，只不是日本人为了打捞2008具骸骨而故意布下的迷魂阵和施放的烟幕弹罢了，想不到中国人真的当起了冤大头，赴汤蹈海地干了起来，被日本人大大地涮了一回火锅。面对大海那边日本人站立于礁石之上，通过望远镜飘过来的轻蔑狡诈的眼屑，真令人欲哭无泪，郁闷至极！

“北京人”到底在哪里?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悬而未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困惑的泥潭。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极其明确的，这就是——

“北京人”头盖骨自被中国的裴文中与贾兰坡于1929年和1936年在周

口店发现后，便交由美国人控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负责保管。随着珍珠港事件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中下落不明了。

2001年12月7日，美国第54届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与25名60年前珍珠港事件的见证人以及上千名水兵，登上停泊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口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以纪念珍珠港事件60周年。在前往参加纪念仪式之前，布什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公告，宣布将星期五（12月7日）定为“国家珍珠港纪念日”。他要求在这个神圣庄严的日子，所有的联邦办公室降半旗，以表达对珍珠港事件受害者的哀悼。

这个仪式仅仅过去三年之后的2004年12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社转发了日本驻华盛顿记者近藤丰和的专稿，谓：与去年一样，今年布什总统在纪念珍珠港事件的文稿中也删除了“日本”二字。不仅如此，今年还删除了“不经宣战”的字眼。文章将此归结为“日本在伊拉克等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和美国“对两国同盟关系的重视”云云。

对美国人这一新的做法和暗号，绝大多数日本新闻界保持了沉默，只有《朝日新闻》一家特立独行地站出来，在社论中提到了珍珠港事件，并以《今天是什么日子》的醒目标题，提醒日本人民这个日子与往日的不同。同时指出：岁月是会淡化人们的记忆的，但有些记忆是不能淡化的。各国国情不同，记忆点也有所不同。彼此应该了解对方的记忆，这样才能加深信赖关系云云。

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翻云覆雨，美国人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就会把珍珠港事件从记忆里抹去，建立一个“大太平洋共荣圈”，借以称霸海空陆地。但中华民族决不会忘掉这场由日本人发动，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罪恶战争，当然还有战争中在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的“北京人”。正如20世纪50年代由周恩来总理审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外发表谈话所说：“‘北京人’化石是在美国人手上搞得下落不明的，只有美国人才能说清什么时候丢的，怎么丢的，丢在了什么地方。”

因而，要搜寻“北京人”的真正下落，最应该站出来并承担相关责任的，当然是美国人和日本人。

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看到的，除了“在纪念珍珠港事件的文稿中也删除了‘日本’二字”和“不经宣战”的美国政府，连同一个对侵华战争死不认账、死不谢罪的日本政府内阁，没有看到这两个政府或那一个美国人站出来，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表示过忏悔之意，更没有站出来说明是在“什么时候丢的，怎么丢的，丢在了什么地方。”

或许正如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20世纪初叶于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言：“中国人必须明白，中国人的利益和世界上强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如果有一致的地方，那是偶然的巧合。中国人必须自己团结起来奋斗，才有出路"（《TheProblemofChina》，1993）。尽管美国与日本在“北京人”失踪事件上的态度令人愤慨、郁闷加失望，但可以相信的是，世界一切有文化良知的进步人类对“北京人”的搜寻不会停止，人们对它的热情也不会消减。或许，正如杨钟健所说：在全世界正义的科学工作者的关心与支持下，总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物归原主的。

——归来兮，“北京人”！

（完）

1992年一稿于济南

1999年二稿于北京

2006年12月9日三稿于亚运村